

越南：革命的流产

译者按：本文件译自 <http://bannedthought.net/Vietnam/ForeignCriticism/Vietnam-Miscarriage-1979.doc>。

[该有先见之明且重要的未署名文章发表于《革命》杂志第4卷第7至8号，1979年7月/8月，由美国革命共产党出版。它未（据我们所知）重印或被其他网站提供。本文附带有一些照片剪辑，但这里未包括。（它们的复制质量相当差。）]

十五年来，越南一直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心。它使美国资产阶级屈服，并引起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支持和同情。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失败给美帝国主义带来了巨大的物理打击。因此，无论在战胜美帝国主义后越南发生了什么，越南发动的解放战争都是历史性的进步斗争。

但越南确实发生了一些事，一些非常坏的事。领导抗击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许多人中止了越南人民的革命。成为苏联走卒的现实取代了独立的目标；阶级剥削继续存在的现实粉碎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希望。

印度支那人民争取解放的战争展示了革命暴力如何克服反革命暴力。它显示了反对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和征服战争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的力量和效力。越南数十年的斗争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民群众发动反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战争的革命潜力和力量，并表明这一潜力确实是削弱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极重要因素。

印度支那人民的解放战争成为美国内部的巨大力量。它使数百万人与自己的统治阶级斗争。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有意识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它有助于推动新的革命组织在美国的形成，其中包括发展为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组织。美国人民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斗争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堡垒。当资产阶级看到“敌人的旗帜”被带到反战示威中并目睹自己血腥的帝国主义旗帜在无数场合被欢乐地焚毁时，他们充满愤怒和沮丧。

然而，今天，曾经是解放军的越南军队已经成为柬埔寨的侵略和占领军。在过去的四年半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大举进入越南，用他们的爪子勒紧越南人民的脖子并将他们拖入他们的超级大国战争集团。1978年6月，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苏联经济控制其东欧卫星国和古巴的工具。1978年11月，黎笋、范文同和其他越南领导人前往莫斯科，他们与苏联签订了“友谊与合作”的条约——其核心是军事联盟与合作。自对美战争结束以来，苏联向越南投入了大量武器，以及数千名顾问和技术人员。越南已经成为苏联渗透该地区的重要角色，这一角色合宜地对应于越南领导人成为东南亚“大国”的雄心。

越南与苏联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关系日益紧密。被派往邻国柬埔寨掠夺以建立亲河内和亲苏联的傀儡政权的苏联武装和资助的军队是这一新殖民主义关系的主要的和最明显的例子。但是其他事实，无论大小，都指向同一点。

西贡沦陷后，越南和苏联达成了一项经济协议，规定苏联参与越南未来的经济计划。苏联人并没有为他们的“慷慨”支付苛刻的报酬。过去的几个月里，苏联技术人员被安置在美国在岘港建立的基地，以维护和为苏联远程侦察机加油。3月，几百名苏联海事工人和专家到达越南，在金兰湾，美国的数十亿美元的前海军港口工作，他们正处于将其转变成苏联海军设施的第一步。此外，苏联在老挝建造了两个电子窃听综合体，并在柬埔寨建立了雷达跟踪系统。难怪勃列日涅夫集团将越南描述为东南亚极其重要的“前哨基地”。¹

¹ Ivan Ivkov, "Vietnam, United and Socialist," *New Times*, Feb. 7, 1976. Also, Leonid Brezhnev, quoted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Nov. 24, 1978, p. 11.

但是，为了他们的新霸主的工作不止如此。为了努力吸引其他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中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加入苏联网络，越南领导人采取了谴责这些国家的解放斗争的行动，尤其是那些在越南与中国的争执中并未站在越南一边的团体，尽管并非所有这些团体都完全赞同中国修正主义者。今年1月，越南控制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明显被越南支持，如果没有被怂恿，据报道，向泰国共产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放弃在老挝长期建立的避难所。去年，越南总理范文同在访问东盟国家期间，向在马来西亚反共叛乱中阵亡的反动政府军敬礼，并公开放弃援助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随后谴责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河内的公共广播电台攻击了菲律宾新人民军，菲律宾共产党的军事部门，称其为“非法的极端主义组织”，并称其革命工作“增加了其在菲律宾的颠覆活动。”²

越南出了什么问题？为何它从发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滑向发动对柬埔寨的反动战争？这个曾激励了数百万人民的国家，现在怎么在如此众多的人中引起厌恶和犬儒主义呢？

一、越南革命的本质

与中国一样，越南的革命必须是两阶段的革命。第一阶段，毛泽东描述的被压迫被殖民国家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封建，旨在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国家——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历史的这一刻，既维持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又阻止越南这样的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力量是帝国主义。因此，尽管革命的这一阶段在社会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但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它必须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者。此外，毛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但为社会主义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正如毛泽东继列宁和斯大林后指出，中国，自1914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和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全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³这就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即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在越南反法战争于1954年胜利之后的几年中，世界革命力量的具体组合发生了巨大变化。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越南以及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奠定了世界舞台和条件。现在，由赫鲁晓夫集团领导的苏联修正主义政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被反革命力量击败，为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出了重要的新问题和条件。

就像早先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分界线是承认列宁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拒绝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以及支持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一样，现在，毛泽东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力量的暴露和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已成为世界各地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面临的决定性问题。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历史性斗争极大地影响了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进程和背景。向帝国主义屈服的问题不仅是与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一部分，而且这场斗争进一步揭示和理解在这些国家向革命斗争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性质和困难。社会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的时期。

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阶段的经验时，毛泽东在1937年写道：

“.....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⁴

⁴ Mao Tsetung, "The Task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eriod of Resistance to Japan," *Selected Works*, Vol. I, p. 273.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拥抱勃列日涅夫，巩固越南与苏联的新殖民关系——
经互会（一个 20 年的军事同盟）会员资格，以及苏联支持入侵柬埔寨。

越南革命被从内部出卖，人民被送入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魔掌。

越南和其他地方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过程涉及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并且有许多陷阱和障碍。因为斗争必须经过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一阶段，并且因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设法团结全国各个部门，包括为这一目标而战的许多资本主义分子。从民族利益（实际上是国家的资本家），而不是从工人阶级（其最终目标是消除全球各地的剥削和压迫、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自发拉力。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是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后来又以彻底的修正主义出现，感染并最终导致越南革命的领导层落入了死胡同——结果，革命的第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完成，越南沦为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自愿的武器。

1970 年代，随着在中国与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再次加剧，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一分析的意义和适用性远远超出了中国革命。⁵ 这些资产阶级力量中的许多人在某一时刻，尤其是在夺取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民主化斗争的完成之前，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一旦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特别是在这个阶段它发展得更加深入时，他们就反对革命，反对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后来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资深的共产党员，虽然职位很高，但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深化，他们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事实证明，这些人从本质上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在组织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加入共产党。他们未能跳出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从这种角度看中国革命。对他们来说，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让群众从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尽管他们偶尔会说这样的话），而是中国从一个陷入封建生产关系的落后国家向现代的、强大的和比得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的转变，并投射他们的形象。他们在资本家的技术面前低头，并为中国设想了一个类似的未来，无论哪个阶级掌权。（当然，这种资产阶级观点的谬误可以从今天中国的结果看出，距走资派夺取政权仅有三年。）

然而，中国和越南之间存在差异。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无法夺取政权并控制党，直到毛死后。革命路线整体主导党直到那时。在越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走资派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从未遇到过党的最高层的重大反对，至少没有代表了严峻挑战的反对。

在越南，革命领导主要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讨厌帝国主义统治自己的国家，并且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像胡志明⁶一样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现代越南人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斗争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世界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革命阵营。印度支那人民在法国殖民主义的束缚下受苦。在与之抗争的斗争中崛起的革命者被磁铁之力吸引，吸引到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光明灯塔，这是唯一一个彻底支持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斗争的政治运动。1960年，胡志明写了一篇题为《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的文章，文中他回忆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在巴黎做工……我常常散发传单，控诉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罪行。那时候，我仅是出于自发的感情而支持十月革命。我还没有完全懂得它的重大历史意义。我敬爱列宁，因为列宁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解放了本国人民。在这以前，我从没有读过列宁的著作……”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会之行中，可以看出胡的资产阶级幻想和眼界，在那次会议上，他试图恳求威尔逊听取他为越南解放所作的以美国总统自己的十四点为蓝本的八点计划。胡被毫不客气地送出门。⁸胡继续解释：

“我参加法国社会党，只是由于那些‘先生和女士们’（那时候，我是这样称呼我的同志的）同情我，同情各被压迫民族的斗争。至于什么是党，什么是工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还不知道。”⁹

在继续描述他在社会党内部修正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的支持者与以列宁为首的新的第三国际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中何去何从时，胡接着说：

“我最需要知道的，然而也是人们没有在会上讨论的问题是：哪个国际维护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权利呢？……”

“起初，正是由于爱国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引导我信仰列宁、信仰第三国际的。我在斗争中，一边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一边做实际工作，逐渐地懂得：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够把被压迫民族和全世界劳动人民从奴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¹⁰

⁶ Ho's father is reported to have been a well educated Mandarin in Ha Tinh province who was dismissed from office because of nationalist activities. Cf. Jean Lacouture, *Ho Chi Minh: A Political Biography*, p. 12.

⁷ Ho Chi Minh, *Selected Writings*,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Hanoi, 1977, p. 250.

⁸ Lacouture, *op. cit.*, p. 24.

⁹ Ho Chi Minh, *loc. cit.*

¹⁰ *Ibid.*, pp. 251-2.

² John McBeth, "A Battle for Loyalty in the Jungl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8, 1977, p. 19ff.

³ Mao Tsetung, "On New Democracy,"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Vol. 2, p. 343.

⁵ Yao Wen-yuan, "On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Lin Piao Anti-Party Clique," reprinted in *And Mao Makes 5*, R. Lotta, ed., Banner Press, 1978, p. 196ff.

但是，正如越南革命的过程所表明的那样，胡和其他领导人从未真正完成跨越——肯定是不彻底也不完全——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组织上，胡成为共产党员，但在思想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留在凡尔赛宫。

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用“列宁主义组织”的形式并不能使你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无非是称自己为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并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实验室使您成为一体。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门科学，是一门活着的科学，必须适用于任何社会的具体条件，并且必须在斗争中发展，但是仍然要按照某些普遍原则进行运作。确实，在某个阶段和某些条件下是革命者的人可以在另一阶段和不同条件下变成反革命者。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个人或政治运动中并不以某种纯粹的提炼形式存在。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等其他观点或意识形态相矛盾。问题是哪一个是主要的，在任何给定时间总体上代表革命者的眼界。对于越南革命和该革命斗争的领导人而言，要考察他们长期以来的政治路线和实践——特别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无产阶级路线还是资产阶级路线的问题是最尖锐和最关键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了上风，这是主要的。本质上，在与帝国主义统治作斗争的条件下，他们仍然是革命民族主义者。但是在某个时刻（战胜美国之后），他们转向其对立面——他们成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民族主义工具和直截了当的反革命分子。

正如鲍勃·阿瓦基安同志在他最近的著作《毛泽东的不朽贡献》（该书概括了对中国反革命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

“今天在许多尚未从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国家中，这是否已不是一种普遍现象？有许多人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共产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不是那种人而且（最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¹¹

阿瓦基安继续解释，这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目标是克服他们国家的落后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几乎完全的扼杀。因此，他们转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将其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的最有效、最快捷的手段。

他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的经验：

“……已经清楚地表明，尽管在结束殖民（包括新殖民主义的）统治的斗争中胜利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推进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然后继续在社会主义阶段前进是更为困难的——即使在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这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运动中最绝大部分中，即使是由宣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的运动，也没有前进到社会主义，因此实际上，他们甚至未能从帝国主义赢得完全的解放，而是落入了一个或另一个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之下——一般是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在此期间）。”¹²

对于越南革命的领导人来说，他们的民族主义将他们引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表面，隐藏着机会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实质。对胡志明和越南党的其他领导人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门活着的科学，人类完全解放的最终目标的指南。而是一个虚构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彩袋，主要是有组织的，可以用来促进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实际上，胡用这种方式表达了很多次：

“在我国和中国，流传着关于装有神机妙计的‘锦囊’的故事，当人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打开锦囊，便立即找到解决的办法。对我们革命者，对越南人民来说，列宁主义不但是神奇的‘锦囊’，不但是指南针，而且是照亮我们走向最后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的太阳。”¹³

¹¹ Bob Avakian, *Mao Tsetung's Immortal Contributions*, RCP Publications, 1978, p. 318.

¹² *Ibid.*, p. 317.

¹³ Ho Chi Minh, *loc. cit.*, p. 252.

尽管有时他们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角度表达了最后的胜利，但他们的彩袋方式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他们对他们所走的道路视而不见。

列宁指出，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即未能渗透到事物的矛盾本质的实质，并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看到其主要方面，或者试图调和两个互斥的事物，是以机会主义方式伪造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欺骗群众。”“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¹⁴

折衷主义与实用主义密不可分，是越南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征。这可以从他们对革命两个阶段之间关系的路线的审查中看出，特别是在他们对统一战线中党的作用的想法中；他们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党内围绕团结与斗争的路线和行动中；他们的军事路线和战略；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性质中。

二、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越南党成立于1930年，当时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简称“印支共”，1951年更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更名为越南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越南党经历了早期的难产和成长阶段，帝国主义势力再次开始相互斗争，迫使世界重新划分。战争条件，占领东南亚的日本人的失败以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的暂时崩溃，在1945年为越南人提供了党史上所说的“黄金机会”，千载难逢的机会。¹⁵通过新组建的越南解放军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以及北方的人民起义，民族解放军得以进入北方的临时权力真空，并于1945年9月2日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是，在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下，一个实力已衰弱但同样坚决的帝国主义法国几乎立即采取行动，重新建立了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1945年到1954年，越南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英勇而成功的抵抗战争。

越南与法国殖民主义斗争的首要问题和任务之一是如何使最广泛的人民团结起来与共同敌人斗争。

成立时，印支共对越南的局势做出了大致正确的评估：

“首先，我们党认为越南是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外国帝国主义者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的人民。农民约占人口的90%。由于这些原因，在越南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矛盾：第一，越南人民与夺走他们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第二，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应全力集中解决的根本矛盾，是越南人民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依靠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我们的国家。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依靠他们的保护来维护其利益和特权。因此，为越南革命设定了两项任务：

“一、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并赢得民族独立——它的反帝国主义任务。

“二、推翻封建的地主阶级，进行土地改革，并实施‘耕者有其田’这一口号——它的反封建任务。

“这两项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分开：要赶走帝国主义，必须推翻封建地主。反之，要推翻封建地主，就必须赶走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是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两个主要目标，是要推翻的两个主要敌人，但更重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因此，[党]必须集结一切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力量，并实行广泛的民族联盟政策。”¹⁶

¹⁴ V. I. Leni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 p. 24.

¹⁵ Truong Chinh, *Forward Along the Path Charted by Karl Marx*,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Hanoi, 1973, p. 93.

¹⁶ *Ibid.*, pp. 40-44.

然而，1936年，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战略（在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影响，印支共改变了其近期计划，并扩大了加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

尽管反德国法西斯的斗争的焦点在半个地球之外，并且在越南几乎没有直接意义，而距日本法西斯占领印度支那的举动还有数年之遥，但印支共还是放弃了独立斗争，将自己适应于在越南成立反对日本的人民阵线。为此，胡志明宣布：

“一、在这个时候，党不可以提出过高的要求（民族独立、议会等），如果这样就会陷入日本法西斯的圈套。只可要求各民主自由权：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新闻和言论自由、释放全体政治犯，为党获得合法的活动而斗争。

“二、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努力组织广泛的民族民主战线。这个战线不仅是印度支那人，而且是连在印度支那的进步的法国人也包括在内，不仅是劳动人民，而且是连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

“五、为了发展和巩固力量，扩大影响和使工作有效果，印度支那民主战线必须和法国人民阵线取得密切的联系，因为该阵线也是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并且可以给予我们极大的帮助。

“六、党不可要求战线必须承认它的领导权，党必须表示出自己是最能牺牲、最活跃、最忠诚的一个部分。只有通过日常的斗争和工作，广大群众承认党的正确政策和领导能力，那么，党才能争取到领导的地位。

“七、要实现以上任务，党必须对宗派、狭隘等思想作不调和的斗争，必须有系统地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提高党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必须帮助提高无党派干部的水平，必须和法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¹⁷

1936年夏，印支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暂时搁置”口号“推翻法帝国主义”，并着手组织印度支那反帝人民阵线。但是根据一部党史，“这种组织形式无法在印度支那分裂法国人的队伍，不能孤立激进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动殖民主义者。因此，印度支那反帝人民阵线随后改为印度支那民主阵线。”¹⁸

撇开共产国际所设想的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普遍适用性问题，至少可以说，该党放弃其对民族独立的要求的决定是非常可疑的。

尽管党后来批评自己“过于保留以至于不能宣布其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立场”，¹⁹但该决定反映了党对自己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的概念和对帝国主义敌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任务的理解。胡志明对共产国际方针的热心很可能受他多年来在印度支那担任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角色所影响。还应该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个人民阵线时期，全世界共产党的许多弱点和修正主义倾向才开始急剧显现。

1936年6月的党代表大会甚至区分了“超级帝国主义者和反法西斯帝国主义者。”²⁰这反映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许多共产党为在它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和“最反动”派之间划清界限而做出的同样努力，基于此制定他们的策略。

至于越南人，胡和印支共在这一点上的立场，特别是围绕该党在统一战线上的作用（未能在独立性问题宣布自己的立场，必须是“最忠诚的……和真诚的分子”，但忠于什么，对什么真诚；以及未能在自己的路线和纲领与试图正确地团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路线和纲领之间进行真正的区分）反映了以后将更强的趋势。从政治上讲，它代表着某种实用主义，上面引用的整个表述，包括劝告“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实际上却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而透彻的马克思列宁主

¹⁷ Ho Chi Minh, “The Party’s Line in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Front,” report to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July 1939, *Selected Writings*, pp. 42-43.

¹⁸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Viet Nam Workers’ Party*, FLPH, Hanoi, 1971, p. 13.

¹⁹ *Ibid.*, p. 15.

²⁰ Lacouture, *op. cit.*, pp. 67-68.

义分析，泄露了他们的折衷主义。必须要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指示是否与党的干部、群众和其他一些民族主义势力之间强烈反对要求与殖民主义大师团结一致的方针这一事实无关，即学习“马克思主义”以证明机会主义是正当的。

同样在这一时期，由于殖民关系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共产国际将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监督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移交给了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热情不容质疑，即使其动机是出于促进法国殖民主义在越南的统一。

随着 1939 年战争的爆发和法国在入侵的德国军队之前的瓦解以及 1940 年合作的维希政府的建立，由维希官方代表让德匈上将率领的法国殖民政府在印度支那安定下来，法国控制该地区，与日本达成便利的安排。

1941 年，一个新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即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目的是“团结所有爱国者，不分财富、年龄、性别、宗教或政治观点，以便他们可以为解放我们的人民和拯救我们的国家而共同努力。”²¹ 越盟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者和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了武装宣传和游击斗争，并成功地在中国边界北部的北柏波地区（Pac Bo region）划出了解放区。

到 1944 年，在胡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武元甲的指挥下，当地的游击队被整合到解放军的雏形中。当法国成为盟友后，日本人突然攻击法国殖民主义者并囚禁了大部分殖民地军事和行政领导人时，越南人抓住了机会。胡于 1945 年 8 月发出要求全面起义的呼吁，越南军队进军河内。1945 年 9 月 2 日，新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巴亭广场举行的 50 万人聚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

北方政府成立了，在斗争的那个阶段正确地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其中包括许多公开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势力。但是，通常很难区分这些势力的观点和胡志明本人的观点。

在胡写的宣告越南独立的宣言中，他模仿了《美国独立宣言》和 1791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的空洞话。

“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应享有天赋的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天赋人类自由和平等的权利，而且人类应该时时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

胡谴责法国资产阶级践踏自己的原则：

“可是，八十多年来法国殖民主义者却利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来侵略我们的国家，压迫我们的同胞，他们的行为完全违反了人道和正义。”²²

这些关于人的权利的宣言，即使是在被写成的时候，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崛起的努力，其目的是召集周围劳动人民群众与英国和法国的王制斗争。早在 1878 年，恩格斯就蔑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关于人的权利的宣言：

“……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²³

即使在与资产阶级势力统一战线的背景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把这种资产阶级的欺骗推向前，这有什么意义呢？他明显地企图“揭露”法国资产阶级未能达到“自己的标准”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不是与法国资产阶级和好（并顺应越南民族资产阶级的话），这意味着如果他们采取了正确的行动，那么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撇开该宣言是否是谴责法帝国主义者、暴露帝国主义本质的时候或地点的问题，事实是胡做得恰恰相反。他掩盖并模糊了帝国主义敌人的性质。在越南革命的这个紧要关头，他揭示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他本人和党的视野中的

程度，并展示了他们距离把革命无产阶级领导权交给本国的民主革命还有多远。这不仅是吹毛求疵的问题，而且在行动中也得到了证实。

当然，法帝国主义者对胡和印支共的这些资产阶级自命不凡一点也不印象深刻，正如胡后来表示愿意让越南留在法兰西联盟和印度支那联邦，他们决心重申对越南的殖民统治。²⁴法国占领军向河内进军，尽管进行了数月谈判，但很快就很清楚，越南独立的唯一途径是武装斗争。到1946年底，敌对行动爆发。新政府和党的领导层从河内撤回农村，开始了解放战争的另一阶段，以驱逐殖民地霸主。越南领导人再次采取行动，扩大了对法国的统一战线。官方党史说：“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全体越南人民在捍卫民族独立和统一，捍卫和发展八月革命的成果的坚决斗争中崛起。”²⁵

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第一步很奇怪：他们正式解散了党。只剩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协会。这一举动显然至少有一些异议和争议，因为到1951年2月越南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胡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辩称：

“当时党不能犹豫：犹豫意味着失败。党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并采取措施，甚至是痛苦的决定，以挽救局势。最大的担忧是党宣布自愿解散。但实际上，它进入了地下。

“尽管在地下，党仍继续领导政府和人民。

“我们认识到党宣布解散（实际撤入地下）是一个很好的措施。”²⁶

这一段胡的演讲的摘录摘自修正主义美国共产党的出版社1970年出版的他的作品集，因此没有理由怀疑其准确性。但是越南共产党内部以后一定进行了一些评估，认为这实际上不是一项“好的措施”，或者至少不是他们在试图宣布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时应该做的事情。因为在1977年河内版的胡的选集中，²⁷这整个部分都被排除在演讲之外。没有省略号，没有解释的脚注。关于解散党的所有提法都被简单地删除了。

这不仅是“考据”的一种做法，也不意味着该党实际上已经解散。显然不是，至少不是完全。党的文件断然声明，实际上党并没有解散，而是转入地下。党的领导人的确继续领导解放战争。党的机构，至少在某些层面上，继续发挥作用；当然，在最高级别上，党的机构继续定期开会。实际上，1946年至1951年这段被解散的时期显然招募了許多人。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它对斗争的性质、党的任务及其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反映了什么政治理解，使他们感到有必要宣布该党已经解散，即使有必要进入地下吗？在修正主义者白劳德领导下的美国共产党也于1944年解散了几个月，尽管某种形式的党组织继续发挥作用。这一行动代表了修正主义的观点和政治路线。

该党当时面临的条件是困难的。法国军队占领了该国南部，并向北部的河内进军。1945年，国民党的几个师以盟军的名义伪装接受日本投降，他们进入该国北部，尽管他们同意将控制权移交给返回的法国人，但他们一直在忙于掠夺和抢劫。国民党领导人希望粉碎印支共并消除它在中国境内爆发的内战中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任何可能的联盟或相互行动。党的规模很小，在1945年只有大约5,000名党员。

但是这种解散手段是要愚弄法国人还是国民党？几乎不。这是要征服世界舆论吗？要说“这里没有人，除了我们民族主义者”？这本身就是揭示。当然，问题不在于地下化原则上是否不正确，许多政党面对不利的条件，都面临着秘密运作的必要性，但即便如此，这些政党也试图找到途径，进行非法的秘密共产主义鼓动和宣传。但是，在革命力量有相对行动自由的农村根据地的斗争范围内，暗示外国军队的存在而完全消除党的公开形象（即使大多数党员对党籍保密），这不是理由，或者说是一个错误的理由。

这一举动很可能是针对其他民族主义势力的，是试图团结更广泛的反法国势力，他们在统一战线中与共产主义者建立组织联系方面很不高兴。这在胡关于需要“时间逐步巩固人民力量和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声明中被暗示。但是，这种在爱国斗争中实现团结的务实方法，除了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外，唯一的实质就是保证那些试图将斗争限制在民族主义范围内的势力的政治不受

挑战。在某些方面，他们与古巴革命中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路线很相似：以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参加反帝国主义战争，在此基础上赢得民众的支持，然后在他们被公认为领导人和得到群众支持之后宣布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者”——而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在此期间，越南劳动党（简称“越劳”）领导层在与越南南部的美国战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与此类似。每个人都熟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阵”），其中正确地包括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所有阶级的越南人。但是，尽管在越劳和民解阵的文件中偶尔提到了它，但鲜有人听说过越南南部的人民革命党（简称“人革”）。它成立于1962年，据说是南方的一个独立政党，领导着民解阵。当然，人革的组织领导层（在越劳的指导下）确实领导了南方的斗争。但关键是，无论是独立机构还是分支机构，人革的作用都被低估了，它的领导力是通过斗争的组织而不是政治路线来进行的——通过其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指出了当前斗争之外的方向，以及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描绘了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这绝不意味着党的民族解放战争的主要任务本应是“为社会主义而战”，如托洛茨基派断言。这也不意味着民族斗争应该从属于阶级斗争。即使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也有责任在统一战线中在政治和组织上发挥独立的作用，而不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屈服于资产阶级。

越南共产党领导人的立场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上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²⁸

后来，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战争中，越劳文献确实谈到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作用以及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从阶级立场看，所有问题与战线方针有关……单方面的团结，没有斗争，在实践中导致团结的破坏和战线的清算。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进行一场有原则的斗争，即以共同的政治纲领为基础并旨在执行这一原则的斗争，而不是打破团结和削弱战线，那将是唯一可以加强团结和巩固战线的斗争。”²⁹

然而，在对法国人的战争的第一部分（1946-51年）中，越劳的做法是正式解散该党，而党的鼓动和宣传仅限于斗争的民族目标，与后来这些表述截然不同。甚至在那时，在与美国的战争中，当该党规模更大，而且显然是无可争辩地领导斗争时，他们的途径仍然是统一战线的阶段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与革命中公开宣称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有“原则性的”政治分歧，不是围绕斗争的最终目标，而是围绕修正主义的观点，即如何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私有制来最好地发展国家。（见下文第五节。）尽管对统一战线和党的爱国主义任务进行了很多讨论，但对这一时期社会发展过程和阶级力量之间或党的各种任务之间的真正关系并没有一个整体认识。

三、“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团结

经过九年持久而英勇的斗争，越南人击败了法国，并结束了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主义。但是越南人现在面临着试图将其爪子勒在他们的脖子上的新的帝国主义秃鹰。美国资助了法国80%的战争费用，并决心进军法国停战的地方。

越南和法国之间签署的《日内瓦协定》规定该国临时分裂，并于1956年举行统一该国的选举。（对这些论点的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美国已经开始为了巩固自己在南方的立足点，建立了其可信赖的血腥的吴廷琰（他以前以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合作而闻名）傀儡政权。

党和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执行的当前的任务，是为人民确保足够的食物和他们的被战争蹂躏的土地的基本重建：通讯和交通的恢复，重新建立基础产业等。到1957年，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包括土地改革，重建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堤防等。他们现在面临着应遵循何种方针的决定。正如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长征所说：“……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我们应该等待国家统一吗？”

……我们党的答案是不。”³⁰另一方面，很明显，将美帝国主义赶出越南并完成民主革命仍然是党和人民面临的重大任务。

问题是：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任务与南方的解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而且，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这些问题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将来临的巨大风暴的背景下进行辩论和决定，并在未来几年内开启。这将对越南革命的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1956年，赫鲁晓夫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拖回资本主义的进程。他宣称，前进到共产主义的关键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创造财富和富足，这将为共产主义提供物质基础。他吹捧在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消灭的理论，同时他与党和国家机器的新资产阶级摧毁工人阶级统治的形式，使人民群众成为利润的奴隶，并向他们提供一碗土豆炖牛肉作为补偿。

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和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三和”的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和平共处。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现代化者”，不再需要对资本家进行暴力革命。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战争再也不会不可避免。赫鲁晓夫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已经变得如此合理，事实上，所有战争，包括为从帝国主义中解放民族而发动的战争，都可以而且应该被阻止。此外，对于这些新的修正主义者而言，“和平共处”的含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应与帝国主义者进行“全面合作”，使之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加上帝国主义现在愿意与社会主义合作的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就其不断增强的力量的本质而言，将通过和平竞赛击败帝国主义。实际上，不仅没有必要进行暴力革命，而且肯定是危险的。因为根据赫鲁晓夫集团的说法，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例如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大火”，最终可能导致核大屠杀。

1960年8月《真理报》发表的社论很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逻辑、苏联的国际路线及其“社会主义”标签背后的联系：

“如果人们事先知道战争的龙卷风会破坏所有劳动成果，那为什么要构造、建造、创造呢？”³¹

赫鲁晓夫着手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他腐朽的修正主义背后。他遇到了来自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抵抗的铁墙。（对于历史斗争的更详细的分析见1979年6月发行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1956-1963》）。

“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决不能丝毫放松对于革命的准备。

“按照我们的了解，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具有现实的意义。”³²

他们揭露赫鲁晓夫路线的最终结果：与美帝国主义协作和调解。

“……他们所谈的‘和平’，完全局限于为帝国主义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能接受的‘和平’，是企图降低各国人民的革命水准，使各国人民失却革命的斗志。”³³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场斗争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划出了鲜明的界限。越南人试图跨越这条线。但是他们不能。他们的中间路线和“锦囊”折衷主义无法掩盖，危急关头时，越南劳动党中的修正主义战胜了马克思主义。

最早的迹象出现在1957年，当时他们决定将北方的重建列为重中之重，反对继续进行解放南方的斗争，并在此期间着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苏之间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使他们的计划陷于不合时宜和非常不幸的境地。

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计划时，很明显，他们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但是中国不仅反对他们制定的计划，而且也无法提供越南领导人要求的那种援助。另一方面，越劳内当然也有一些人强烈反对公开站在苏联一边反对中国，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亲苏修正主义势力也认为公开反对中国的路线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对于苏联支持的可靠性，肯定有些犹豫和缺乏信心。

这种情绪只可能被赫鲁晓夫的1957年初建议提高，即联合国既承认北越又承认南越。这种向南越出卖和抛售越南人的企图，引起了胡志明和党的领导人的强烈和愤怒的反应。赫鲁晓夫被迫迅速撤回他的建议。但这并没有使越南领导人偏离他们所计划的路线。

特别是在公开场合，胡和其他越南领导人开始扮演伟大的和解者的角色，主张“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团结起来”，并刻意拒绝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采取公开立场。直到1964年，在革命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变得绝对清晰和不可更改后，胡志明在法国日报《世界报》的一次采访中说：“革命党派之间的此类争端始终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他在1969年的遗嘱中说：“我坚信各兄弟党和各兄弟国家必将团结起来。”³⁴

越南方式的典型代表是1960年他们在罗马尼亚的党代表大会上的作用，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政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赫鲁晓夫利用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恶性攻击。当中国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和平共处”路线时，越劳政治局委员黎笋谨慎地避免了这一基本问题，发表了棉花糖演讲，但未能超越越南和罗马尼亚之间关系的一些平凡细节。1960年12月，在莫斯科的81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胡再次强烈要求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团结起来，并提出要扮演斗争的仲裁者的角色。但是，这场争端是针对基本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可以任意解决的。”中国代表团一度走出会场——抗议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并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胡也离开会场，不是为了抗议，而是去苏联观光。胡的法国资产阶级传记作家让·拉库尔特在1960年9月举行的越劳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描述了另一独特的场面，并得到了在场其他人的证实：胡笑着牵着苏联和中国代表的手，“在难以置信的外交使团前，请成群的代表团加入一首‘一切放在一起’的副歌。”³⁵

值得赞扬的是，尽管与公开的中间路线相吻合，但越劳确实在一年后于莫斯科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拒绝参与苏联策划的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谴责。但与此同时，胡又提出了争取统一的提议，并作为调解人提供服务。

许多人形容胡志明是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出色的调解人、“中间人”和机敏的政治家，试图使越南摆脱与“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中任何一个的纠缠。“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理更远，或更多是一种资产阶级分析。其他人则认为越南的立场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面对建设自己国家的必要性以及美国及其南部傀儡政权的威胁，越南人必须避免疏远或损害中国或俄罗斯的支持。但这并不符合逻辑。

显然，越南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这样看的。这不是指示他们如果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路线，应该如何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处理这一矛盾的问题。越劳并非是在讨论和辩论这个决定性的问题，并采取内部立场来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出于实际和外交原因，决定不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边并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恰恰相反。尽管肯定有一些尖锐的斗争和分歧（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报道），但他们的中间路线归结为机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当他们确实在1960年和1961年多次表达明确立场时，他们站在苏联和主张缓和南方解放斗争的苏联路线一边。

在黎笋（几个月后被任命为越南劳动党总书记）1960年4月初的一次演讲中，主张限制在南方的斗争。

“北方人民永远不会忽略他们尚未解放的一半国家的任务。但是在当前时刻，当存在维持世界持久和平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的世界运动向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可能性时，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南方指导和限制解决这一问题，解决帝国主义与我国殖民地之间的矛盾。”³⁶

他被迫承认这将为南方斗争造成“麻烦”。但是，立足于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路线，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实力占上风：

“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比帝国主义力量更强大。在我们国家，北方的社会主义力量也在大力发展。尽管这种形势给南方革命带来了许多麻烦，但优势是根本。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社会主义力量的这种优势，帮助南方革命顺利发展。”³⁷

一年前，赫鲁晓夫本可以在与尼克松的“厨房辩论”中使用黎笋作为后援。

所有这些背后的论点是，通过保持“和平共处”，南方的吴廷琰政权会崩溃，美国会被迫退出——同时北方可以快速推进它的建设计划：

“如果能够维护和平，美国-吴廷琰集团的积极计划将迅速失败，其极权法西斯政权将迅速瓦解。如果能够维护和平，革命势力将享有必要条件强有力地发展。因此，维护和平是革命口号。”³⁸

何时“维护和平”是“革命口号”？列宁认为，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当然，列宁、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者谈到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防止这种特殊战争的爆发。但是民族解放战争、武装叛乱和一般的革命战争呢？为了“维护和平”也要避免这些吗？

当然，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意思。1960年9月1日，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开幕之前，以及南部解放力量的斗争升级导致民族解放阵线形成的前几个月，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问题上公开宣布越劳与苏联结盟：

“如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们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能够防止战争，检查帝国主义者血腥的双手，维护和平并从新的世界大战，核战争中拯救人类。”³⁹

范文同再次谈到“防止战争”。这恰好是苏联路线的呼应，它表示必须防止一切战争——以便“拯救人类免遭核战争。”范和苏联修正主义者一样，不区别必须反对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必须支持的革命战争，鉴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如果被压迫国家的人民要赢得解放，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供的越南劳动党在拥抱苏联路线和反对革命路线（其中毛泽东是最优秀的拥护者）方面走了多远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他关于新党章的报告里，黎德寿沉重地抨击“教条主义”。虽然这表面上旨在针对党内“机械研究和应用国外经验”的势力，中国人显然也是攻击的目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已成为赫鲁晓夫及其朋友针对中国的流行语。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没有错。在回应苏联代表穆克希迪诺夫的讲话时，他说：“绝不能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⁴⁰

这些对中国路线的或多或少的公开攻击并与苏联站在一边，标志着早先（以及随后的）中间路线，有趣的是，仅仅在大会开幕前，胡志明飞往莫斯科，在那里他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一周。尽管没有关于这些讨论的官方报道，但暗示对中国路线的这种攻击可能是赫鲁晓夫要求做出的折衷方案，这似乎并没有过度推测，因为苏联承诺支持在大会上宣布的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⁴¹

但另一方面，大会标志着对黎笋早期呼吁限制在南方的斗争和声称吴廷琰政权会因其腐烂覆灭的修改。相反，大会对北方的重建与南方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采取了更加折衷的两点立场：

“在现阶段，越南革命有两项战略任务：

“首先要进行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下解放南方，实现国家统一和全国各地的完整的独立和自由。”⁴²

但越南人民军首席指挥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在大会发言中，明确强调：

“目前，北方经济建设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减少国防预算和削减军事效能的原因。”⁴³

但不足为奇的是，大会还有其他一些措辞似乎在“平衡”或在给出关于南北问题的另一面。武元甲在同一讲话中说：

“……而谈到我们党和平统一的方针，我们许多同志都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阴谋；他们根本不明白，虽然我们的政策是维护和平和实现和平统一，我们应该总是准备好应付敌人的任何花招。这是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对当前世界局势没有全面了解；他们只看到赢得持久

和平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仍然存在战争危险。……他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帝国主义的阴谋……”⁴⁴

一个论点可以被提出，大会的不同表述反映了越劳内部的路线斗争，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我们许多同志”似乎并不理解或遵循党的“和平统一”的政策。这些论调在他们的折衷主义中是如此“全面”，而且党从前关于“和平共处”的声明，包括大会的一些声明，都明显地反对南方的解放战争，不难想象多少人被弄糊涂了。

无论党的领导人的希望和计划如何，接下来的两年南方的斗争都迅速升级了，这使得几乎不可能不看到美国不会退出，也不会同意某种南方的“中立”计划，将解放力量留在原地，就像他们后来在1962年（错误地）签署了老挝协议一样。为响应不断上升的抵抗运动，民解阵于1960年12月成立，肯尼迪开始将美国对南方的军事干预升级。公开战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经开始。

加剧南方战争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直面赫鲁晓夫要求越南人努力使一切冷却的坚持。无论越劳领导层希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苏联不会为战争提供援助，1963年和1964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转向了由中国共产党最强烈地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黎笋在1963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承认：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寻求通过和平手段实现革命，但无论如何，如果剥削阶级诉诸于对人民的暴力，则应考虑和平与非和平这两种选择，应当牢记向社会主义非和平过渡的可能性。”⁴⁵

12月，他表示要进行更激烈的断裂，并主张暴力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⁴⁶他的讲话印满了中国的《人民日报》的版面。

1963年7月，军队报纸《学习》发表了军事指挥官阮志清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公开推翻了先前的立场：

“我们对美国没有任何幻想。我们不会低估我们的对手——强大而狡猾的美帝国主义。但是我们不惧怕美国……相反，如果人们惧怕美国，并认为冒犯美国将告失败，而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将引发一场核战争，那么剩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与美帝国主义妥协并屈服于它。”⁴⁷

在关于北方建设与南方斗争的角色和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确定的变化：

“一个强大的越南北方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仅仅北方强大就可以了，南方的革命运动将自动获得成功……北方建设本身无法替代南越固有的社会矛盾的解决。”⁴⁸

最后，所有人中的黎笋开始警告国际修正主义的危险及其对越劳的影响：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被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尽管人数很少，但这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⁴⁹

不幸的是，越南劳动党这种对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新的澄清和谴责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被勃列日涅夫罢免，尽管苏联修正主义路线没有根本变化，但这确实标志着一些新发展的开始，例如，最初的行动是从开放和无耻的和解政策以及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转向争论之一。就越南而言，新的苏联老板最担心战争的必然性和俄罗斯自身缺乏支持将使越南更加接近中国，而中国仍然是反对美国侵略的武装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1965年2月，美国开始轰炸北方，第二个月，随着第一次大规模部队升级，南方战争的“美国化”开始了。苏联总理科西金同时访问河内，并提出了新的援助承诺，以抵御美国的空中战争和地面部队的升级。强调莫斯科的立场没有根本转变，然而，赫鲁晓夫被允许在1965年8月从流放地公开发言再次警告说，“麻烦始于越南之类的小事，终于灾难。”⁵⁰

越南领导人似乎满足于随着赫鲁晓夫的去世苏联再次一切正常，并迅速消除了他们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到1966年，他们回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谈话和对苏联发展的赞扬。

他们决定修正主义不再是苏联问题的直接动机是新的援助，以及越南意识到苏联将提供他们一些重武器、飞机和火箭以应对他们当时想与美国作战的战争类型。但是，如果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是直接动机，那么根本原因就是它们与苏联路线的根本统一。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担心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并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说法成为谬论的斗争，但这只是从影响他们自己的民族斗争的角度出发。这是越南领导人不仅在解放战争的背景下将阶级斗争从属于民族斗争，而且把这两种斗争看成是完全相同的最清楚的例子之一。他们决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团结，以免民族斗争受到不利影响。

但还比那更深刻。对他们而言，“社会主义”仅仅是实现其民族解放目标并将越南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最佳形式。这就是工人阶级长期利益的代名词。他们看不到苏联修正主义有什么毛病，因为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者所进行的斗争揭露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工人阶级革命目标的放弃和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他们认为团结的破裂对他们实现目标至关重要）的阶级斗争被视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他们在党内的团结路线方面也存在同样的资产阶级观点。黎笋在 1973 年表示：“我们决心‘维护党的团结，就象我们喜欢掌上明珠一样’。党绝不会容忍宗派主义的任何表现，宗派主义是反对革命的最严重的犯罪。”⁵¹因此，反对革命的最大罪行不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反革命路线，而是破坏党的磐石般的团结的宗派主义！但是，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在共产党中占主导地位，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必要时设法分裂它。党内缺乏激烈的政治斗争，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取得胜利的最确凿的迹象。

越南共产党因缺乏内部政治斗争而臭名昭著。他们所谓的“批评——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准干部。你可以引用一页又一页越南领导人多年来一直不愿提及的干部缺点和不足。黎笋说，意识形态团结“通过民主集中制得到了牢固的保证……”但是“……‘意识形态自身无法实现任何事。’必须通过组织将意识形态转变为行动。”⁵²是。但是事实是，在党内，就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样，他们把团结的问题置于为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斗争的必要之上。他们对党的最终标准不是其政治路线，而是其组织统一性。对组织统一的需求成为防止争夺正确路线的方法。越南领导人的著作中没有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更不用说集中在党内。因此，对于像中国现在的统治者一样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围绕资产阶级路线的“团结”，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以及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其工作原理。

毛泽东在 1958 年指出：

“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⁵³

越南领导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团结一致以及在自己的政党中团结一致的路线，是衡量他们陷入这种停滞不前的修正主义的程度的尺度。他们此时围绕世界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折衷表述和立场是试图掩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一种简便方法——也可能是平息党内乃至全世界革命者愤怒的标准作业程序，他们仍然需要他们的支持。但是，中立的立场不可能消除所涉及的问题和原则。而且，就像在 1960 年代初出现的那样，它们根本不是中立的。从根本上说，他们支持苏共领导的现代修正主义，尽管越南的民族斗争强度是按照“中间派”政策决定的。由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越南劳动党内部取得了胜利，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将来会发现他们与苏联的资产阶级路线越来越团结。

四、军事路线

在越南，军事路线是决定性的；就是说，它是几十年来越南斗争的具体条件中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的集中体现。在过去 5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是越南革命的主要形式。因此，对越南领导人的军事路线和战略的分析是理解的关键，并必然反映出导致他们进入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阵营的政治和思想路线的根源。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论持久战》中指出：

“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即由主观因素决定的正确指导，战争中的领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⁵⁴

毫无疑问，就军事和技术实力而言，越南人远不及法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他们的军事策划者永远无法弄清楚，在如此优势下，越南人民怎么可能胜利，进行争取解放的正义战争的小国怎能打败进行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者。武元甲将军在 1969 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中提到列宁，以指出其基本原因。他说，列宁指出，“归根结底，任何战争的胜利取决于群众在战场流血的意愿。群众对战争的原因和目标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胜利的保证。”此外，他还引用列宁的分析认为，“谁有更多的储备和人力资源，谁能够比其他人更坚定地站在群众和人民中，谁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⁵⁵

数百万越南人民在北方和南方的英勇无私的抵抗，证明了他们愿意在战场上流血，并且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了解战争的原因和目的。再加上法、美和伪军的士气低落、不断瓦解和公开叛乱，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群众对战争的仇恨日增、不愿继续进行侵略，还有全世界对正义革命斗争的支持，证明列宁所说的适用于越南人民的胜利。

但是，还有另一个今天必须回答的更直接的问题。一个为赶走日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而进行了如此长时间英勇奋战的国家，怎么会这么快地陷入苏联帝国主义的魔掌中，不是被武装力量击败，而是从内部被背叛？

我们已经开始表明，总体上，在关键关头，修正主义路线在越南劳动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下一节将说明，越劳不仅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反而使该国与苏联建立了新殖民主义的关系，并使该国变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沼泽。

但是，一个如此饱受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侵扰的政党，如何带领人民赢得反对法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

首先，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相对），可以并且已经成功领导了反对反动政权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军事斗争。仅举几个例子，古巴⁵⁶、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尼加拉瓜。但是，正如这些国家所显示的那样，决定性因素是，尽管许多国家中的领导党和组织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只有彻底扎根于并受指导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政党才能领导为完成胜利而进行的斗争，即真正脱离帝国主义和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在上面提到的几乎每一个不发达国家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解放战争都导致了新形式的殖民依赖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或苏联）的征服。

⁵⁷

第二，这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客观条件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斗争的形式，并赋予了它们整体上的进步、反帝国主义的特征。由于压迫者缺乏先进的军事和技术能力，决定性的力量初始平衡有利于敌人，人民力量通常需要发动持久人民战争。也就是说，即使是要击败直接敌人，更不用说赢得彻底解放，甚至资产阶级革命者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群众的力量（他们大多数只装备最原始的武器）。他们之所以能够动员群众，是因为斗争在客观上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他们又能够主张资产阶级领导权，是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与群众有着共同的斗争：摆脱殖民主义政权。

通常，斗争最初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其中规模小、机动性强的民兵打击敌人，可以迅速果断地击败敌人，并且在每场战斗中逐渐加强民兵并削弱敌人。这场战争必须长期进行，因为敌人由于其优势，不会轻易而迅速地削弱。随着力量平衡的开始转移，民众力量的增强，可以组建正规的军事单位，并可以在较大规模的交战中成功地对抗敌人。由于大多数殖民地国家和新殖民国家主要是半封建国家，农民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而敌军及其力量集中在城市，这些战争通常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

毛泽东总结了人民战争的理论 and 战略，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将其发展到最高水平。他把持久人民战争描述为总体上的消耗战。但是在这一消耗的总战中，打歼灭战，一点一点歼灭敌军，逐步改变力量平衡，这是关键。他没有为拖延战争而主张持久战争。他的观点是，斗争必须对敌人发动最重打击，同时保存和加强人民的力量。他强调了诱敌深入、用群众将其包围、将其力量切成数块并歼灭的重要性。他坚持在任何特定的战斗或战役中集中优势力量消灭劣势力量的原则。

毛泽东并没有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待人民战争战略——而是基于对人民和敌人的长处和短处的全面评估——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这一战略对于在政治上削弱敌人和在政治上增强人民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赢得军事胜利，也可以延续并继续这一胜利，以便在驱逐帝国主义及其国内走狗后，人民群众可以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把人民战争的战略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必要的两阶段革命的背景下，这种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权要求和定义的。没有这种领导权，就不可能把斗争的第一阶段进行到完结并前进到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发动人民战争和建设社会主义都需要教育、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资产阶级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路线影响的人，即使当时他们还不构成一个资产阶级，也只能以有限的方式实现有限的目标，即民族主义目标。这是由于他们与群众的根本矛盾，因为他们想摆脱旧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从而使资产阶级的利益得以发展和占统治地位。他们的取向是在每一个步骤中寻找胜利或胜利捷径的途径，这些胜利或胜利捷径将阻止或减少动员和依靠群众的必要性，因为即使被迫一定程度上依靠群众，他们的资产阶级眼界也使得他们在引起革命斗争的人民的眼中退缩。

今天，这种资产阶级取向非常明显地出现在苏联推动的路线下，并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拥护，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在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领导了解放斗争。他们说，战胜美帝国主义只有依靠苏联的援助和武器——并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而且，在赢得最初的胜利之后，这条路线认为，成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唯一途径是依靠援助、技术进口（包括军事）和来自苏联集团的更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顾问。这是一条久经考验的新殖民主义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者遵循类似的路线，试图取代欧洲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

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中国革命对越南和越南抵抗力量领导层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与法国殖民统治作斗争的初期，越南领导人采取了人民战争的策略。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至少在早期，就毛泽东在人民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路线，存在一些意识形态统一。即使从日益支配其眼界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它行之有效。正如黎笋在总结逐步走向胜利的方法时所说：“没有什么像成功一样成功……”⁵⁸

但是，尽管越南领导人利用了中国的经验，但在与美帝国主义战争的过程中，越南领导人也对其关键方面表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特别重要的是反对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败劣势兵力的战术制定。正如黎笋所说：“……我们的部队和人民发明了独特的战术方法，可以使一支较小的部队攻击一支较大的部队。”这不仅是军事战术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正如我们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依靠群众，还是依靠武器和技术，以及必要的动员和政治教育群众的程度。

当然，一个国家的革命斗争不应该机械地亦步亦趋地效仿另一个国家的榜样和经验，也不是不应该针对其自身情况的特殊性创造性地采取正确的总体策略。不是寻找在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差异，并说越南领导人必须是修正主义的，因为他们偏离毛的方针的这点或那点。必须评估的是越南领导人如何看待这场斗争，以及其军事战略和战术，以及其军事方针表达了什么取向和政治路

线。他们的军事路线的某些根源可以在对法国人的战争中看到，但是在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中，这些趋势变得更加成熟。

当对法国的战争开始时，力量平衡显然对殖民主义者有利。正如一部党史描述的情况：

“我们的抵抗战争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1945年法国人和日本人造成的可怕饥荒几乎使我们的人民筋疲力尽。敌人拥有配备现代武器的空军、海军和陆军。我们只有新组建的步兵，经验不足，一无所有。”⁵⁹

党迅速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三阶段计划。

“1947年初，长征同志撰写了《反抗必胜》……基本原则规定如下：我们的人民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一个拥有强大军队和大量武器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打持久战，而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在维持和发展自己的部队的同时使越来越多的敌方有效部队瘫痪……要打持久的抗战，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团结全体人民，动员他们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进行反抗，并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斗争。我们人民的持久反抗要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主动损耗和大反攻。”⁶⁰

可以看出，这种方法通常与毛泽东为中国制定的人民战争战略相对应。战争的头几年是运动战和阵地战，越盟阻止了法国人巩固对农村的控制权。游击部队的力量不断增强，机动常规部队被连成整体。法国人首先尝试闪电袭击的策略，以消灭越盟部队，并阻止它在北方建立根据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战争的重要进展，因为它使越盟得以随时获得稳定的武器供应和训练部队的根据地。然后法国指挥人员和战场策略的一系列变动开始了，以击败越盟。

最终，法国人决定放弃扩大军队和占领农村的企图，转而采取将部队集中在红河三角洲的人口中心以及北方河内市和海防市的战略，军事行动集中于此。1953年中，法国将军以及他们的美国顾问和金融家实施了他们的“战争结束”计划。所谓的纳瓦拉计划，一方面旨在发起一场扫荡战役，以摧毁越盟游击队根据地，并进攻中国边境的越南自由区，以吸引和耗尽其主要力量。同时，法国人打算建立新的伪军营，并在红河三角洲重新组建新的部队。

武元甲描述了越盟打破纳瓦拉计划的战略：

“具体问题是：敌人正将部队集中在红河三角洲，并对我们的自由区发动进攻。现在，我们是否集中力量面对敌人或动员力量向其他方向进攻？问题很困难。在集中力量与三角洲的敌人作战时，我们可以保卫我们的自由区：但是这里的敌人仍然强大，我们很容易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在用我们的主力部队向其他方向进攻时，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脆弱地带消灭他们的大部分部队；但是我们的自由区将因此受到威胁。……保持主动，我们应该集中兵力进攻相对脆弱的战略要地。如果我们成功地保持了主动，我们就可以取得成功并迫使敌人分散其兵力，最后，他们威胁我们的自由区的计划将无法实现。”⁶¹

那描述了发生了什么。在1953-1954年冬春的战役中，越盟在越南全国乃至老挝和柬埔寨发起了连续的大战。法国人被迫放弃集中于红河三角洲，而是将部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以阻止进攻。当战斗集中在老挝北部时，法国人开始在越南东北部山区十一英里长的高原奠边府集中兵力，他们曾在此修筑防御工事作为进攻东北自由区的跳板。奠边府成为焦点。法国人认为它是坚固的堡垒。将近两万名士兵集中在三个坚固的据点，并在上方山麓放置了重炮。

越南人决定攻占奠边府，攻击敌人的最强强化牢固阵营，并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一次经典的攻坚战，从1954年3月13日开始的长达55天的激烈战斗中，越盟打破了敌人的防线，并给法国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双方的损失都是巨大的，但这破坏了法国人的后背和他们继续战争的决心。

奠边府是八年来人民战争的顶点，越盟拖垮了敌人，而建立了自己。武元甲说，决定发动战斗的唯一标准是他们是否可以获胜。基于一系列因素，他们确定他们可以——并且他们是对的。考虑到条件，攻占奠边府的战略是正确的。但是，从十年后全面展开的针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期间出现的军事路线的角度回头看奠边府，似乎很明显，随着胜利的到来和发展，一

种眼界出现了，这远非完全正确。越南领导人对奠边府的总结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一条总体上修正主义的路线日益占统治地位，使他们朝着在常规战中赢得常规部队的快速且决定性的胜利的战略方向发展，而不是在人民战争中彻底动员群众。而且，1954年衰落中的法帝国主义不是与1965年或1968年的美帝国主义同样的敌人。

美国对越南的设计并不精妙。在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达成之前的几个月中，美帝国主义者推动了一项计划，要求英国和法国“联合行动”入侵越南，以阻止越盟赢得胜利。失败的是，它们是最终解决的推弹杆，实际上用北纬16度线分裂了该国。随后他们迅速行动以巩固南方的美国傀儡吴廷琰政权。

1960年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时，美国在维持对越南南方的控制权方面面临着重大危机。尽管尽了一切努力，吴廷琰政权仍处于混乱状态。他采取了无情和流血的措施，将地主统治和封建条件重新强加给了在抗法战争期间越盟解放了的地区的人民。该政权的全面衰败和堕落、腐败和压迫，以及美国训练并供应的警察和军队，曾引起人民的反抗和斗争的激烈波动。

随着对吴廷琰政府的抵抗日益活跃，非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帝势力都受到了他压迫措施的压力，这场斗争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自发地移向了更高和更有组织的水平。越南北方的领导人尽管愿意冷静地处理南部的斗争并集中精力于北方的建设，但清楚地了解到，如果不在南部发挥更加积极和支持的作用，可能会将领导权丢给非党分子。他们决定在南方日益增长的反抗战争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决定，既体现在1960年代第三次党代会的决议中表明南方的斗争是党的两大任务之一（尽管居于第二位），也体现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成立。

民解阵成立于1960年12月。在与美国及其傀儡吴廷琰的日益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公开游击战中，它团结和激励了许多民族主义力量和人民群众。美国统治阶级要求采取新措施来恢复其控制，肯尼迪以麦克斯韦·泰勒将军在越南南方发起的“特种战争”作为回应，麦克斯韦·泰勒最终成为美国驻西贡大使。

这场特种战争使南部的美国军事“顾问”急剧增加，并大大增加了对吴廷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场特种战争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战略村”计划，该计划是约翰逊安抚农村计划的先驱，该计划归结为将农村地区解放力量强大而活跃的村改造为集中营。

即使在约翰逊接手前，肯尼迪的特种战争也是民解阵的胜利，吴廷琰表明自己相对于美国的目标越来越没用。因此，美帝国主义者暗杀了吴廷琰并扶植了另一个傀儡。后来，约翰逊以自己的升级版“有限战争”来代替“特种战争”。

在此期间，北越领导层试图遵循第三次党代会设定的路线：“限制”南方战争、同时将北方建设为“强大根据地”。暗示民解阵的成立反对、甚至完全独立于北方领导层，是愚蠢的。另一方面，在日内瓦协议与1960年民解阵成立之间，南方的反抗运动是自力更生地发展的，不仅团结了前越盟干部和支持者，而且团结了其他反吴廷琰的民族主义力量。这些发展的实际效果和北方最小援助的事实是，民解阵发动的对美国及其傀儡的斗争发展为人民战争，在这一阶段，是游击战。它开始撕裂美国稳定形势并巩固其控制的梦想。

到1964年，美国面临选择：在南方的失败还是升级战争。不用说，它选择了升级战争。约翰逊以1964年8月的东京湾事件为借口，迅速下令轰炸北方，到1965年初，通过派遣第一批美国军事力量，开始了“美国化”战争。在南方的美军最终将超过一百万人。

南方斗争的发展和美国的升级战争和北方的轰炸，迫使北越领导人的优先事项和军事方式发生变化，至少暂时，他们改变了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上的公开立场，如上所述。

中国革命者继续向越南人强调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质，以及事实上它会不择手段地维护和扩展印度支那的统治，以及在实践中不重视南方斗争这一点上他们之间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对于越南领导人来说，越来越明显的是，第三次党代会上制定的方针无法按照他们的设想行事，美帝国主义者除了军事斗争之外别无选择，胡、黎笋和其他越南领导人转持中国人的观点。

1962年，随着越南南方人民革命党的成立，他们更公开和直接地领导了民解阵，并增加了武装人民战争的必要性的言论——以及攻击“现代修正主义”。

但是，北方的轰炸和南方的地面部队的升级带来了新的转机，并揭示了越南领导人与苏联的团结程度，不仅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及中苏论战中的重大问题，也涉及军事战略问题。因为当1965年柯西金来到河内并承诺援助，他受到热烈欢迎并导致河内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攻击有所下降，他承诺以苏联条款提供苏联式援助——打一场苏联修正主义类型的战争，不重视动员并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在苏联向越南人提供军事援助的新意愿的背后，无意看到这场斗争取得军事胜利。援助伴随着的是苏联不断施加的与美国进行谈判达成和解的压力。

与中国提供的那种军事援助（主要是AK-47和其他小型武器，用于打一场人民战争——尽管他们还提供了防空火炮以及用于筑路的人力等）形成鲜明对比，苏联援助并不预示着持久人民战争——恰恰相反。苏联在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会上散发的针对中国人的信中描述了他们的援助：

“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了大量武器，包括火箭装置、防空火炮、飞机、坦克、沿海火炮、军舰和其他物品。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接受对飞行员、火箭人员、坦克驾驶员、炮兵等的培训的支持。”⁶²

这不是越南被迫打的战争所需的军事援助，而是使他们依靠苏联人的训练、技术和替代的援助。如果越南人陷入苏联援助网，这将使苏联对越南斗争的军事方针和目标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不是绝对的控制力）。这是与敌人的大型正规部队交战的军事援助——符合苏联的希望，即在战场局势将对越南人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迅速将斗争推进到谈判解决。在第二十三大信对中国立场的一再攻击和歪曲中，可以看出苏联人的做法和意图：

“……中国领导人需要一个漫长的越战保持国际紧张局势，表示中国作为一个‘被围困的堡垒’。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发起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中国领导层的目标之一。他们希望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使他们可以，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坐山观虎斗’。”⁶³

中国人担心和反对的是越南人使自己处于可以被俄国人卖光的地位。因为苏联援助与苏联和美帝国主义的持续合作并不矛盾。中国人正确地担心美国和苏联包围甚至袭击中国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当时美国资产阶级的重要部门认为，如果越南人开始依赖苏联式援助，或者甚至苏联直接存在于北方，这也可能不是一件坏事。长期担任帝国主义主要发言人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65年表达了这一观点：

“……最终，可能会做出安排，将苏联军队部署在北越……而美军仍留在越南南部……更直接的苏联军事介入的悖论式的优点之一是建立了这一领域的美苏直接谈判关系。”⁶⁴

实际上，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即美国升级战争和北越军人被派往南方之后，越南的做法主要是在常规单位对阵战中寻求对美伪军的决定性胜利。1967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给麦克纳马拉的秘密备忘录清楚写道，当时美国正试图评估他们认为是击败民解阵必需的部队水平：

“根据1966年56个排型和大型交火的可靠详细记录，我们根据战斗的发展对这些战斗进行了分类。表中的前四个类别均代表敌人在对阵战中愿意并有意识地站立和战斗的情况，这些类别包括56场战斗中的47场（占86%）。”⁶⁵

换句话说，越南人倾向于采取与美国正规部队一决雌雄的战略——当然，依靠苏联式援助，这将使他们更加朝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越南领导人对北方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与他们1965年至1966年最初的军事战略之间的联系。在完成南方民主革命显然仍是越南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的阶段，领导层将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工业化上。迅速采取行动来建设北方经济并使其尽可能强大地成为战争基地是没有错的。但这真的是越劳的眼界吗？相反，他们对苏联盲目乐观的和平共处谈话的拥护及对南方斗争的限制，表明他们的观点更像是将南方的斗争爆发看作是对北方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的干涉。因此，希望迅速果断地战胜美国，以防止由于美国空战而破坏新的工业基础。至少他们希望可能有一个快速谈判达成和解的机会。

但是，尽管他们寻求胜利的捷径，但北越领导层很快意识到当时的条件不利于通过谈判达成和解。随着 1966 年和 1967 年美国集结部队在南方，完全进入状态，军事斗争远未解决，谈判只能导致在南方美国控制力的巩固。1966 年下半年，越南领导人似乎也总结出，试图与美国正规部队正面交锋是行不通的。

1966 年，越劳统一部主席分析了不同势力推动的军事斗争和谈判的路线：

“美国人觉得有必要进行谈判，但是是在强势地位谈判。……一些国家希望我们进入谈判，任何形式的谈判——所以大的战争不会爆发，而且该战争才能结束——忽视越南的利益。其他一些国家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打败美国人，如果不能，[他们认为]我们应该进行谈判。（这些国家大多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国家。）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认为，[适当的][谈判]条件必胜，并且为取得成功做好了准备。……中国认为，谈判条件还不成熟，要等到后几年，甚至更糟，要等到现在后的 7 年。同时，我们应继续战斗以消灭敌人。……我们的方针：继续战斗直到我们可以同时战斗和谈判的某个时间。”⁶⁶

但是，尽管他们被迫在实践中反对苏联（即“东欧”）的压力和再次转向人民战争的战略，这是战争的条件和必然性的要求，他们的寻找快速决定性胜利的倾向和强调高科技战争的趋势依然存在。

在武元甲将军和其他越南领导人的著作中，杂乱无章的措辞描述了他们打的那种战争。从这一切中产生的结果，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说，都不是绝对的，在每种情况下都不正确。但是，他们的立场是一个总体方向，尽管没有以任何方式消除群众在斗争中的作用，但往往趋于美化、并越来越强调“新型”人民战争的高科技操作，“由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的精锐特种部队独立作战的方法。”这个概念被提出来替代毛泽东始终集中优势兵力击败弱势兵力的路线。该战略确实“特别强调了开发使用所有武器和设备的最高效率。”⁶⁷

简而言之，武元甲和其他领导人在 1966 年以后制定的军事战略和路线可以概括如下：战斗部队的核心是正规部队，尤其是每个武装部门的独立战斗。“除了步兵以外，解放军的其他武装部门，例如炮兵、特种兵、工程兵、防空兵等，都有其战斗方法。”⁶⁸更原始的武器武装起来的群众被动员，以提供战力辅助这些部队和提供必要的后勤和生产支持。因此武元甲说：“我们党主张必须将现代和相对现代的武器与原始武器联系起来，并以使我们三种部队和全体人民的战斗力增加的方式不断改进和现代化我们的武器和装备。”⁶⁹但有其他声明，例如“武器装备是战斗部队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是其力量的基本要素，”⁷⁰对这些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的日益重视，揭示越南领导人实际整体上将其视为胜利的关键。

据武元甲说，战斗的前线无处不在——山区、农村地区（平原和三角洲）和城镇。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区别哪个是主要的和为什么。这与持续进攻的策略有关，无论是在较小规模的交战中使用精锐部队，还是在较大的战斗中使用完全常规部队。虽然显然有一种游击行动诱捕和伏击敌人的伴随策略，但没有更多地强调诱使敌人深入并用群众包围，这是毛泽东所描述的战略防御的一部分。

在人民战争的发展阶段，最后阶段大反攻采用普遍起义的形式。从最后阶段的观点来看，武元甲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 1945 年 8 月革命的经验，当时敌人在河内的据点从内部坍塌，并伴有全面起义。

越南战争显示了群众对人民战争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热情。但是，越南领导忘记了这一教训。越南领导人不断寻求捷径，一条胜利的捷径，希望避免持久的冲突。

有趣的是资产阶级的但富有同情心的法国军事专家 1970 年的评估。他评论说，武元甲关于精锐部队的想法更接近切·格瓦拉的游击精英概念，而不是毛的理论。这些机动性极强的小组主要由各种类型的专家组成，并配备有优质的装备和火炮，是春节攻势的先锋。

然而，越南领导人实际上是在 1966 年和 1967 年大部分时间里观察了力量平衡的情况，到 1967 年底，他们开始说，这些条件有利于发动全面进攻，这将引发南方的全面起义并导致短时间内最终胜利。⁷¹ 1968 年 1 月 29 日，在春节假期期间，越南南方各地展开了这种协调一致的总攻。解放军袭击了南方的每个主要城市。在西贡，他们袭击了军事高级司令部总部和美国大使馆。民解阵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占领了旧首都顺化 25 天。但是，如果军事领导层期望随后将发生普遍的民众起义，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对于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政权而言，春节攻势是一场严峻的政治失败。它打爆了美国统治者一直在美国媒体上吹嘘的垃圾，即西贡政权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民解阵实际上被击败了，无法发动攻势。在美国，春节攻势为不断发展的反战运动提供了更大的动力。

在越南本身，春节攻势对美军造成了极大的挫败感，标志着对美军内部战争的新一波抵抗。这对伪政权是沉重的打击。在春节攻势期间，大批西贡政府人员和走狗被处决，这对那些可能考虑从事同一工作的人产生了决定性的令人生畏的影响。

它迫使严重地“从头至尾”地再评估美国的战争策略，特别是在威斯特摩兰将军敦促下增兵数十万的效果，以及对日益增长的美国人民反战情绪的新估计。历时 45 天的春节攻势导致美国驻越南指挥官威斯特摩兰被罢免，并迫使约翰逊辞职，其整个越南战略及其“安抚”和“搜索并摧毁”运动彻底丧失名誉。最后，它迫使美国提出公开谈判的要约。

但是解放军也蒙受了惨重损失，最终无法控制任何一个城市。他们南方城市地下干部的大部分基础设施要么被迫与解放军一起撤出，要么如果他们仍留在现在暴露在外的城市，则被美国及其伪军歼灭。

如何从军事上和根据指导路线评估春节攻势？迄今为止，美军“专家”坚持说，春节攻势是越南军队的一次军事失败，尽管伪军感到惊讶，但伪军打得很好。他们声称，只是美国新闻界的歇斯底里式否定主义将之描绘为美国和西贡政权的失败。但是，当时五角大楼的分析师也反对这种观点：

“约翰逊总统面临的政治现实是，越南南方的‘更多相同’，美国的生活和金钱的承诺不断增加，随之对越南产生了影响，在不久的将来也无法保证取得军事胜利，美国公众的这些分子变得无法接受这一现实。在春节攻势之震撼后，关于战争进展的乐观军事报道不再成立。”⁷²

然而事实是，在以全面起义推翻西贡政权并赶走美国的意义上，春节攻势并未为越南人取得军事胜利。但这确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确实是战争的转折点。

但是越南领导人发动春节攻势的前景和方向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这在他们的进一步战争中如何体现？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可以在春节攻势中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并且严重错误地估计；要么，他们无意赢得军事胜利，而是将其视为谈判的伎俩，希望让美国开始和谈。

但是，这两种解释都无法说明形势的实质。更可能的是，而且与越劳的赢得快速和决定性的胜利的努力一致的是，他们正在回顾奠边府，并把目标放在将严重打击美帝国主义和摧毁他们继续战争的意志的军事行动。他们也没有纯粹从军事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越南领导人对美国不断增长的反战情绪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重视。看来，他们希望的是军事胜利，不是像奠边府那样规模（大规模和决定性），但是至少会严重削弱南方伪政府的立场和显著改变战场条件，加上其在美国境内的影响，它会迫使约翰逊政府（或其后继者，春节攻势定时于 1968 年选举几乎不是偶然的）以谈判迅速结束战争。

在军事和政治上，这代表了两个错误。首先，它高估“特种精英单位”的有效和他们采取果断的大规模和扩展的对抗击败美国和伪军的能力。其次，这绝对低估了美帝国主义坚持印度支那的决心。如前所述，因为 1968 年的美帝国主义不是 1954 年的法帝国主义。

关于越南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不了解美国统治阶级的性质及其在越南赢得胜利的决心的一个有力论据是他们采取“利用敌方阵营内部的矛盾”的方式。”一方面，他们谈到美国政府和美国

人民之间的矛盾，⁷³但是他们在实践中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是试图集中精力于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例如，1968年约翰逊和麦卡锡之间，或1972年尼克松和麦戈文之间。同时，他们实际帮助推动一些资产阶级力量成为反战运动的领导人和该战争的人民群众反对派的代表。

在这里，以及对敌人发动春节攻势的力量和决心的一般评估中，对寻求胜利捷径的渴望以及未能将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具体情况分析使他们视而不见。

事实是，在继续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春节攻势的积极成就、敌人队伍的士气低落、推动美国反战运动等等都可以实现，其中包括发动重大战役——但要基于正确基础。也不一定要花费数年才能完成。

整个战争时期也揭示了越劳如何理解动员和依靠群众。因为他们确实依靠群众——从人民在艰苦环境中扮演的角色，到法国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从山上推开重型火炮来袭击奠边府的任务，到在美国轰炸下，成千上万的人向胡志明小道运送数千吨的设备和物资的英勇工作——他们认为，群众的作用（从总体上讲，不仅仅是军事上）相对于武装常规部队的作用、军事后勤和战术规划的光辉、苏联和其他国家提供的武器，是次要的和支持性的。

从最好的角度看，春节攻势是全部人民的群众斗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光辉的见证。中国人强调了春节攻势的那些方面，它们证明了正确的人民战争战略的力量。中国新华社3月25日的一篇报道说：“南越军民春季的伟大胜利，又一次无可辩驳地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南越军民气魄雄伟的春季攻势，动员和组织了南越城乡千百万群众，同解放军一道，投入了一场围歼敌人的战斗。”⁷⁴

然而，以春节攻势为代表的越南领导人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远不及“气魄雄伟”。而中国人则以称赞这种攻势的方式来充实自己的观点，当时所有情况都使他们这样公开说（或正确地说）。新华社3月19日评论说：“美帝及其走狗，目前正在大肆屠杀和迫害起来斗争的城镇人民，妄图挽救败局。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坚决响应胡志明主席的战斗号召的越南人民，再接再厉，排除万难，坚持持久作战，高度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⁷⁵

中国的这一言论和随后的言论都在抨击“捷径”的前景和越南领导人在战场尚未获胜时从谈判桌上的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取胜利的企图。

当然，谈判原则上没错。正如毛泽东所说，有时它们是一种必要而正确的形式，“针锋相对”。像越南这样的国家的解放力量以春节攻势规模上发动进攻，原则上没有错。但是，在斗争的任何时期和阶段中，决定性的是领导斗争的政治路线。领袖们是否努力将主动权掌握在群众手中，是依靠群众及其有意识的行动主义作为唯一能够完全击败敌人的力量，还是代之以谋划和理想主义观念，即没有群众的这种动员和坚持不懈的斗争，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击败敌人。越南领导人处理谈判问题的方式，以及对春节攻势的任何可能解释，都表明了他们不愿真正依靠群众将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人对1968年开始的谈判抱有极为模糊的看法。⁷⁶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看到，美苏合作的邪恶之手终结越南的“危险形势”。整个1967年，苏联人一直在施加巨大压力以开始谈判。“这个”，中国人说，“是妄图劝诱和强迫越南人民放下武器，并在抗美救国战争的他们的大且多的胜利中屈服于美国侵略者。”⁷⁷

但苏联和越南的利益之间存在客观矛盾。前者愿意为达成协议而使美国在南方保持原样，但越南人不愿意。在1968年，美帝国主义者也没有将谈判视为“出路”。他们的目的是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从南方撤军，并利用谈判来加强其针对民解阵的伪军。作为其谈判策略的一部分，美国在南方战争的“暂停”之间进行了轮换，大大加剧了地面和空中战争。南方战争的缓和伴随着老挝和柬埔寨战争的加剧，美国的两个目标是：摧毁民解阵庇护所并阻止胡志明小道上的物资流动；和支持这两个国家的傀儡政权，并打击老挝人民军和红色高棉部队。

南方战争继续以不同激烈程度进行，这标志着越南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影响谈判，并试图在谈判的某些关键时刻取得突破，伴随着更大规模的参与。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战斗重点转移到老挝和柬埔寨。在美国，对战争的反对达到了洪灾的程度。尼克松开始撤离美军和战争“越南化”，同时加剧了空中战争。

春节攻势结束后，它所代表的趋势得到了加强——与大战的苏联路线并驾齐驱，以进行谈判和美国政治选举。直到1972年春，解放军才开始发动另一次重大攻势，这显然又与即将举行的美国大选有关。这又是一次大规模的定期部队对峙，大多数战斗采取固定阵地的形式。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是在老挝边境内的西贡西北部的安禄。与春节攻势一样，虽然在占领和控制主要城市和省份上在军事上并不成功，但它确实加快了撤军的需求，并结束了美国的战争，并伴随着越南为促进麦戈文大选而做出的努力。

尽管他们希望通过决定性的战斗获得快速胜利，但越南领导层试图遵循的方法无法带来他们所寻求的迅速解决。实际上，真正的和平协议直到谈判开始五年后才签署，最后的胜利花了七年时间。

所以，归根结底，尽管向相反的方向努力，越南领导人被迫更多依靠反对美帝国主义者的人民战争战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要求动员人民。但是，越劳实施的军事路线以及在战胜美国之后所采取的行动，突显了中国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尽管人民战争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由各种阶级力量和代表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的力量领导，在不同程度上动员群众打败直接敌人，他的斗争不能在他们的领导下最终胜利。就越南而言，控制革命斗争的这些资产阶级力量将胜利和人民叛卖给苏联帝国主义者。

由于民族主义原因，越南领导人准备与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他们本着同样的民族主义观点，认为他们可以接受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而不会完全落入苏联的控制下。但是，尽管在战争期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但帝国主义的援助从来不会“没有附加条件”，美国战败后，越南就落入苏联的筹码中。而当越南领导层被解除对美国的人民战争的约束，它自己的修正主义观就全面开花，在其对越南和军事的整体方针方面，因为它很快改变其军队为“千军万马”，以对柬埔寨投石块——并事实上占领老挝。

越南入侵柬埔寨是生动的证明，当他们被迫发动反对美国的人民战争时，这些资产阶级领导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或彻底使自己基于它。为了扩大苏联在东南亚的统治地位并推进自己的“大国”野心，越南人发动了他们认为是闪电战的袭击，以推翻民主柬埔寨政府和政党并建立自己的伪政权，就像美国曾试图在越南这样做。相反，就像美国一样，由于他们最初的军事实力，他们赢得了一些暂时的成功。但是他们自己现在陷入泥潭，陷入柬埔寨人民发动的人民战争。越南修正主义者很可能会发现这场战争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一样难以取胜。

五、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

越南劳动党历史上存在的修正主义倾向在美国失败、国家统一后全面爆发。它们集中体现在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路线上。在某种程度上，越南领导人现在公开应用的他们版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和路线是模糊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他们在抗美斗争中所面临的某些需要所掩盖。然而，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来说明，在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他们对如何发展经济的观点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典型的是1961年黎笋在越南工会联合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归根结底，财富的积累来自于生产劳动。以我们的手工劳动、落后的技术和低下的生产力，我们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和集中大量资金。因此，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人民革命运动，依靠全体人民的热情，通过改进劳动组织和技术，充分利用生产中现有的可能性，努力提高生产力，同时必须努力厉行节约，坚决同浪费和腐败作斗争，最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

和财力，以便能够集中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资金。只有通过资本的积累，才能逐步使国民经济拥有新技术，用高生产率的现代机械代替落后的手工劳动，从而为加速我国的工业化作出更大的积累。”⁷⁸（粗体是我们加的）

这句话最引人注目的是，即使作者说到要发动群众，他也说这是因为越南目前“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就像他们动员群众进行军事斗争一样，动员人民在越南领导人看来并不是必要要求，而是因为条件所限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几乎是一种必要的恶行（“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而在谈到依靠革命运动时，他并没有提到从政治上发动群众的主动性，也没有提到依靠群众的自觉积极性。相反，他强调通过“改进劳动组织和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在这种路线的指挥下，黎笋所说的积累只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

15年后，黎笋在代表中央委员会向越南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归根结底，推进社会主义大生产进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生产质量的不断提高。”⁷⁹

术语有些变化，但实质与任何一个全国制造商协会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册中都能找到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

在这种观点下，用“全体人民的热情”提高生产力，就成了发展生产的另一个因素——就像一块煤块、一头牵牛或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如果这是对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的想法（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不难看出，在整个社会的实际运行中，群众将被分配到什么样的角色。

越南领导人认为如何从目前的小规模生产水平达到他们的社会主义愿景，即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答案在于规划，在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正如黎笋所说：

“社会主义大生产只有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建设才能形成。因此，计划是管理和指导从小规模生产向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推进过程的主要手段……我们首先要关心和重视的是产品的使用价值……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创造出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的使用价值。特别是我们必须各个领域制定出有效的计划，在此基础上，调动我们目前最宝贵、最丰富的资产，即劳动力，把整个国家组织成一个建筑工地……另一方面，要重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客观存在的价值和价值规律，灵活运用价值规律和其他多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鼓励劳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材料、设备的消耗，保证用最少的支出生产出最多的使用价值。本着这种精神，我们要正确运用**市场、价格、工资、信贷**等手段，提高计划质量，更好地为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服务，并适度地配合计划的实施。”⁸⁰

我们再次看到越南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典型折衷主义。黎笋承认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双重性质，甚至口口声声说生产使用价值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内容。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了商品本质上的内在**矛盾**，商品的本质中带有阶级、剥削和资本主义的种子，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得非常精彩。他并没有说，商品生产本身以及内在的价值规律是资产阶级的范畴，必须稳定地限制并最终消灭它，才能推进共产主义。然而，黎笋提出了一幅基于社会需要（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和谐共存的社会主义规划图。他当然讲计划，但在什么基础上计划的问题必须被提出。

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任何关于限制价值规律运行的领域以及在所有制改变后继续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残余物的内容。相反，在不断地再次强调“我们必须重视劳动的组织和管理”的同时，还在反复强调“工资必须同劳动生产率密切联系起来，并对生产和技术进步产生符合各行业部门特点的刺激作用。”⁸¹其实，受到重视的恰恰相反：

“当前要努力完善工资制度，使之更充分地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能干而不干的不给报酬；对技术要求高的工作、繁重或不卫生的工作、自然条件艰苦的地区的工作都要有适当的报酬。”⁸²

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在明确社会主义下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同时，也明确了向这一原则无限制地低头的方向会导致的：

“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⁸³

越南的不同之处在于，林彪在执政。

邓小平等中国的走资派一样，越南领导人也特别强调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促进和评价劳动效率和生产力方面的作用。

“此外，金融和银行部门必须通过他们的活动，加强对各分支机构、地区和生产单位的控制和监督。”⁸⁴

但在强调要“发挥价值规律”（好像它不是自发的一样），“实行成本核算，运用价格、利润、工资、信贷等杠杆”的同时，黎笋提醒说：“我们不应该用小个体生产者的小心思来看待利润和亏损。”不，要有大思维，要像成长中的、雄心勃勃的大资产阶级那样看待事物：

⁸³ Quoted in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LP, Peking, p. 1.

²¹ *Ibid.*, p. 75.

²² Ho Chi Minh,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 *Selected Writings*, p. 53.

²³ Frederick Engels, *Anti-Duhring*, FLP, Peking, 1976, p. 20.

²⁴ Lacouture, *op. cit.*, p. 134.

²⁵ *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 pp. 30-31.

²⁶ Ho Chi Minh, *Selected Articles and Speeches*, Jock Woodis, e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p. 50.

²⁷ Ho Chi Minh, *Selected Writings*, p. 111.

²⁸ Mao Tsetung, “The Ques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Initiative Within the United Front,” *Selected Works*, (FLP, Peking), Vol. 2, p. 216.

²⁹ Le Dua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Fundamental Problems, Essential Tasks*, FLP, Hanoi, 1973, pp. 34-35.

³⁰ Truong Chinh, *op. cit.*, p. 47.

³¹ David Floyd, *Mao Against Khrushchev: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Praeger, 1963, p. 284.

³²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SU and Ourselves* (September 6, 1963), reprinted in *The Polemic on the General L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n.p., n.d.), pp. 105-6. (实际上引用自《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附件《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

³³ *Long Live Leninism!*, reprinted in Floyd, *op. cit.*, p. 270.

³⁴ Quoted in Lacouture, *op. cit.*, p. 245. Also Ho Chi Minh, “Testament,” *Selected Writings*, p. 362.

“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最大的利润在于扩大生产，增加部门和行业，增加产品的数量，提高每个部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得上利润，才能使获利与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协调。”⁸⁵

越南领导人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们认识到了经济力的落后，并希望有所作为。但像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一样，他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创造力在根本上是在新基础上发展社会的唯一出路。相反，他们把发展技术和现代工业看作是根本出路，把无限制地实行资本主义方法和原则（以国家所有制的形式）看作是实现他们目标的最佳手段。但是，尽管他们说得很好，但这只能导致对群众的新的剥削，在越南不发达的条件下，只能导致依赖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征服。

相对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人民群众的作用，他们对技术的中心地位的看法，可以从他们经常重复的“三大革命”概念中看出。“生产关系革命、科技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其中科技革命是王牌（kingpin）。**”⁸⁶不管你信不信，这个“三大革命”的表述——包括把科技革命挑出来作为关键环节——早在1970年就已经决定了，在对美战争结束前，那时除了夺取全国政权外，谈论其

³⁵ *Ibid.*, p. 256.

³⁶ Le Duan, *O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Vietnam*, Vol. 1, FLPH, Hanoi, 1965, quoted in Donald Zagoria, *Vietnam Triangle*, Pegasus, 1967, p. 105.

³⁸ *Ibid.*, our emphasis, p. 106.

³⁹ Vietnam News Agency, Sept. 1, 1960, quoted in P. J. Honey, *Communism in North Vietnam*, MIT Press, 1963, p. 79.

⁴⁰ Honey, “North Vietnam’s Party Congress,” *China Quarterly*, No. 4, Oct.-Dec. 1960, p. 72.

⁴¹ Honey, *Communism in North Vietnam*, p. 76.

⁴² *The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 Vol. 1, p. 215, FLPH, Hanoi, quoted in Victor C. Funnell,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65-1976),”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Vol. XI, No. 1 & 2, Spring-September 1978, p. 171.

⁴³ Quoted in Honey, “North Vietnam’s Party Congress,” p. 69.

⁴⁴ Zagoria, *op. cit.*, p. 107.

⁴⁵ Le Duan, “Hold High the Revolutionary Banner of Creative Marxism,” *Selected Writings*, FLPH, Hanoi, 1977, p. 97.

⁴⁶ *Ibid.*, pp. 105-160. [Sic.]

⁴⁷ Nguyen Chi Thanh, “Who Will Win in Vietnam,” quoted in Zagoria, *op. cit.*, p. 109.

⁴⁸ *Ibid.*

⁴⁹ *Ibid.*, p. 111.

⁵⁰ *Refutation of the New Leaders of the CPSU on United Action*, FLP, Peking, 1965, p. 19.

⁵¹ Le Dua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p. 180. Our emphasis.

⁵² *Ibid.*, p. 181.

他任何事情都是荒谬（和修正主义）的。他们认为的建设和现代化经济基础和革命化上层建筑的任务，与发动“阶级斗争”以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出现和统治，之间的关系，在黎笋从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来界定这三重革命时，就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北方赋予人民民主国家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就是要通过同时完成以**技术革命为关键**的生产关系革命、技术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这三重革命，推动北方向社会主义过渡。”⁸⁷

越南人现在走的路，是苏联和东欧的修正主义者走过的老路，他们在中国的新统治者的陪伴下，在这条路上奔跑。在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有一些人，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他们认为，由于国家经济和技术还太落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后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包括越南人在内，在这种“生产力理论”中又增加了一条，认为社会主义下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再加上他们关于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消亡的理论，这意

⁵³ Mao Tsetung, “Talks at Chengtu: Th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quoted in Avakian, *Mao Tsetung’s Immortal Contributions*, p. 172.

⁵⁴ Mao Tsetung, “On Protracted War,” *Selected Military Writings*, FLP, Peking, p. 239.

⁵⁵ Vo Nguyen Giap, *Banner of People’s War. The Party’s Military Line*, Praeger, 1970, pp. 97, 99.

⁵⁶ See *Cuba, The Evaporation of a Myth*, by 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RCP Publications, 1976.

⁵⁷ *Ibid.*

⁵⁸ Le Duan, *op. cit.*, p. 49.

⁵⁹ *Outline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 p. 32.

⁶⁰ *Ibid.*, pp. 31-32.

⁶¹ Vo Nguyen Giap, *The Military Art of People’s War*, Russell Stetler, ed., Monthly Review, 1970, p. 123.

⁶² R. N. McNeal,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mong Communists*, Prentice Hall, 1967, pp. 173-4. Also quoted in Victor Funnell, *loc. cit.*, p. 1976.

⁶³ *Ibid.*

⁶⁴ Zbigniew Brzezinski, “Peace and Morality in Vietnam,” *The New Leader*, April 12, 1965. Also quoted in Funnell, *ibid.*, p. 174.

⁶⁵ *The Pentagon Papers*, Vol. 4, Sen. Mike Gravel edition, Beacon Press, 1971, p. 461.

⁶⁶ Funnell, *loc. cit.*, p. 178.

⁶⁷ Vo Nguyen Giap, *Big Victory, Great Task*, Praeger, 1968, pp. 67-69.

⁶⁸ *Ibid.*, p. 68.

⁶⁹ Vo Nguyen Giap, *Banner of People’s War*, p. 37.

⁷⁰ *Ibid.*, p. 36.

⁷¹ See P. J. McGarney, *Visions of Victory, Selected Vietnamese Military Writings*,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69.

⁷² *The Pentagon Papers*, Vol. 4, p. 603.

意味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等于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越南人对这一切的态度相当开放，他们说，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整个“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⁸⁸ (必须指出的是，当越南人谈论生产关系革命时，所有制问题和生产过程中或分配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充其量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为了支持他们的路线，越南领导人喜欢引用列宁的说法，即“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加电气化”。对修正主义者来说，“苏维埃”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列宁的这一特殊表述充其量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它反映了说这句话时的环境——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但在这些家伙手里，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式。

但是，阶级斗争呢？如果“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中心任务，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斗争又会怎样呢？越南人对其中心任务的表述与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者的表述非常相似，即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按照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一旦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在主要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关系，关键的就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集中力量提高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华国锋在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译注：原文如此，疑为笔误。）上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与此相对应，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即使在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之后，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⁸⁹

1975年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著名反驳，读起来也是针对越南领导人及其“三大革命”的：“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越南人口口声声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谁胜谁负？——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过，他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像他们这样不发达的农业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了区分：

⁷³ See, for example, Ho Chi Minh, “Reply to Professor Linus Pauling,” *Against U.S. Aggression For National Salvation*, FLPH, Hanoi, 1967, p. 100.

⁷⁴ Hsinhua News Agency, weekly English edition, March 25, 1968, p. 19.

⁷⁵ *Ibid.*, March 19, 1968, p. 21.

⁷⁶ For several months the Chinese did not even comment on these negotiations, and when they did, initially it was to warn of U.S.-Soviet ploys.

⁷⁷ *Peking Review*, March 22, 1968, p. 11

⁷⁸ Le Duan, “Speech at the Secon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Vietnam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February, 1961. Reprinted in *This Nation and Socialism Are One*, pp. 37-38. Our emphasis.

⁷⁹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delivered by Le Duan, in *Communist Party of Vietnam, 4th National Congress Documents*, FLPH, Hanoi, 1977, p. 54. Emphasis in original.

⁸⁰ *Ibid.*, p. 53. Emphasis in original.

⁸¹ *Ibid.*, pp. 84, 86.

⁸² *Ibid.*, p. 86. Our emphasis.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是大敌；资本主义由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生产关系体系和为这个压迫和剥削政权服务的巨大上层建筑组成。所以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以各种形式“流血与不流血、暴力与和平、军事与经济、教育与行政”的方式继续激烈地进行着。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如越南——革命]，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和其他一切形式的剥削，阻止小生产向资本主义自发发展的趋势，粉碎敌对分子抬头的一切企图，保证秩序和安全，加强国防潜力……然而，阶级斗争并不限于这些任务。要取得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的根本胜利，要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剥削阶级的征用本身不能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技术基础，对反革命势力的镇压本身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成功。这里的基本问题是把个体小生产转变为社会主义大生产，通过同时进行三重革命，几乎从零开始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⁹⁰

当然最重要的革命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黎笋在这里除了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需要进行持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上层建筑的斗争，而在越南这样的国家，阶级斗争的内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从小规模生产走向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至于阶级斗争中的敌人，以及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几乎都是用“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好战势力”这些外部因素来描述的。例如，在南方，针对的是那些仍未消失的剥削阶级、奴役文化的毒害和美国新殖民主义者造成的社会罪恶，以及美国撤军后仍然猖獗的公开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但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分子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再生而言，那是以说既然它的物质基础是小生产，那么它是在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转变中会被淘汰的东西。至多应该警惕小生产者的心态。

他们对党的作用的想法再一次说明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黎笋说，党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状态，是镇压一切敌对势力反对派的极其有力的工具，但“这是最重要的方面——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参与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管理”。再次把党的作用主要说成是组织作用。而党的优势在哪里呢？在于它的政治和思想路线吗？不是的。

“事实上，一个党执政的力量和战斗力，就在于它所领导的国家机器的效率和活力。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脑，不能懈怠对政府机关的领导……要提高党的组织能力，首先必须提高党领导和利用国家机器的能力，它的一切专门的、专业的和技术的机构，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指导经济和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的需要。”⁹¹

而对于一个党员来说，什么素质是最基本的呢？

“……最好的组织者，是一个掌握组织科学和艺术的人，是一个以灵活的方式去开展组织工作的人，并以自己的组织体系和行动方式的及时变化来应对新事物。”⁹²

而党最缺乏的是什么呢？“经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以及组织和管理能力。”⁹³也难怪他们看不到主要的危险可能来自党内本身！

越南党在大谈组织、技术、快速工业化等时，确实能提出几个关于群众是社会的主人和统治者的关键公式。

“坚定不移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牢牢把握党的路线，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行使和增强劳动人民集体主宰的权利……”⁹⁴

但这种集体主宰的内容和形式到底是什么呢？根据黎笋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方面的含义。从政治上讲，它意味着“坚定地保卫社会主义，坚定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它]既涉及到义务，又涉及到权利……。[如]公民的权利和个人自由……[和]劳动的义务，保卫祖国的义务，尊重和保卫社会主义财产的义务，尊重集体生活规则的义务，等等”。在经济上集体主宰“……包括集体主宰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即公有制]，集体掌握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以及分配领域。”⁹⁵这个相当模糊的表述，在政治报告后来又强调时，被赋予了更多的具体内容：

“我们要把优秀的在职人员选拔、提拔到管理岗位上来，重视他们在经济、科学、技术和管理工作中的培养和熏陶。”⁹⁶

这份报告大大淡化了整个生产关系革命的概念，而把从劳动人民中提拔个人担任管理和专业职务，看作是以某种方式确保劳动人民的“集体主宰”。其实，这更像是一个新精英的公式。在这种路线下，越南领导层在1966年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表现出的敌意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越南革命的漫长过程中，毛泽东所代表和发展的革命路线固然在越南劳动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从来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虽然机会主义和抗法、抗美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迫使他们向毛泽东靠拢，但越南领导层却与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有着最密切的团结。

两年前，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党报《南丹》编辑黄通在接受《曼彻斯特卫报》采访时，对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所持的路线进行了明显的自我暴露。

“1967-68年和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不再把在长期权力斗争中接班的中国领导人看成是社会主义者。1949-1966年期间，共产主义取得了胜利。自此以后，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被摧毁。而1966年标志着社会主义衰败的开始……。非社会主义分子消灭了优秀的激进分子。1966年以后与毛泽东作斗争的人，总的来说是最优秀的人。”⁹⁷

而越南党的路线无疑使他们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如此敌视。中国革命无产阶级进行生死斗争，深化和扩大了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使国际工人阶级取得了惊天动地的历史性突破。这里有毛泽东领导下的革命者，正如毛泽东所说，发展了发动群众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反对资本的锁链重新奴役群众，领导群众推动社会前进，接近彻底摧毁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目标。

但对越南领导人来说，这种景象是可怕的。这不仅是对他们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否定，而且是对他们的整个观点的彻底否定，即希望利用群众的革命斗争来取得政权，然后要求革命停止，人民重新开始工作。文化大革命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上，直接威胁到他们自己在越南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剥削者阶级。如果说今天越南统治者与他们早先支持的一些修正主义者（如邓小平）陷入了斗争，那也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与毛泽东作战的“最优秀的人”才是真正的他们的阶级兄弟。

越南领导层和中国修正主义者提出的革命的形式和目标的相似性是显著的，这不奇怪。在这两种情况下，党的作用主要被看作是组织，在这两种情况下，强调的是管理效率和技术，在这两种情况下，“抓革命，促生产”的概念被简化为“促生产”，群众的作用被简化为生产的促进者。工人阶级统治的形式被劣质化，意味着把选定的工人放在管理岗位上，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运行作为生产的调节器和刺激器得到充分发挥。不足为奇的是，两者都为自己的资产阶级梦想设定了类似的时间表，即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化国家。按照越南人的说法，“我们的目标是，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使我国经济基本完成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过程。”⁹⁸

但是，“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整个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的提法，不仅是彻底的修正主义，而且只会导致把越南人民捆绑在新殖民主义的新链条上。它将导致经济的扭曲和混乱，进一步依赖帝国主义。只要看看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的五年计划的初步执行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诚然，该计划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国家，主要是苏联集团的赠款和贷款。考虑到黎笋对工业和农业关系的界定，以及战后农业生产的严峻形势，按理说应该高度重视农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发展。但重工业不仅被看作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且从长远来看，重工业将马上得到主要的重视。这将意味着迅速扩大从苏联和东欧——以及其他任何他们能得到的地方——进口重型机械和技术，而且根据五年计划，苏联集团的援助计划超过30亿美元，大部分是长期贷款，专门用于工业。⁹⁹为了支付这些进口品的费用，越南人开始把生产方向转向对苏联集团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煤炭、水果和蔬菜，以及棉花、咖啡和橡胶等经济作物。党报《南丹》1978年8月号的一篇社论试图对此作出最好的说明，它表示希望与经互会的关系“将有助于更好地开发自然资源”和“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¹⁰⁰

但与此同时，屈服于苏联剥削其卫星国的“国际分工”路线，社论谈到了越南的“国际合作和分工的义务。”¹⁰¹当然，经互会国家的配额是由苏联制定的。这不是越南领导层第一次向苏联的“国际分工”概念低头。1973年黎笋断言：“目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界，社会劳动不仅应该在各个国家的框架内进行分配，而且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分配。”¹⁰²但正如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越南人也打算成为这一理论的受益者。像苏联人一样，他们并不反对对弱国施加压力，必要时用军事手段来实施这种分工。从被占领的柬埔寨运回的过剩大米，肯定有助于缓解国内的粮食紧缺。

然而，毫无疑问，越南动员对柬埔寨的战争，以及为摆脱在那里陷入的泥潭而付出的代价，再加上动员反对中国未来入侵的威胁，对他们所有的宏伟计划和可疑的经济发展建议都造成了破坏，使越南进一步陷入与苏联的对立。

结论

越南战争是世界正在发生深刻且急剧变化之时的斗争焦点。越南人民的斗争在历史上的一个战略时刻被推上了世界舞台。这不仅使他们为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战斗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强调，而且也使这场革命的领导层内部的修正主义路线得到了极大的强调。越南战争对全世界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刺激了各地人民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但正因为战争对世界各国人民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也使越南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修正主义和中间主义得到了巩固。

今天，就在美帝国主义加紧进行推翻对越南战争的正确判决的运动的时候，这种修正主义的腐朽果实就表现出来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越南领导人在东南亚的大国野心，他们作为苏联的棋子的角色，都被展示在美国人民面前。所谓的反战活动家被召集起来谴责越南——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美帝国主义的论点，即他们试图在越南做的事情一直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亲苏和亲美帝国主义的各种尖锐的声音也在争相对越南的情况作出资产阶级的解释。

由于这些原因，明确越南问题的正确性和错误性是至关重要的。

越南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理应得到全世界千百万人的支持和同情。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问题，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问题，不是好与坏、对与错的问题。它是一个历史发展中客观上哪些是进步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问题，哪些是反动的、阻碍事物发展的问题。

在二战后，美国在帝国主义粪堆中崛起。它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霸道的国家。美帝国主义大摇大摆地横跨全球，对其广泛帝国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充满信心。但早在1949年，中国革命就表明了这个帝国赖以生存的朽木，因为它把蒋介石和他的美国赞助人和金融家扫进了大海。越南战争发生在美帝国主义的转折点上，虽然它不是美帝国主义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却给了美帝国主义最沉重的打击。美国向越南倾注了数十亿美元和数百万人，徒劳无功地企图征服越南人民，守住其帝国的一个关键环节。但这些努力所完成的只是激发了其他国家的革命斗争，加剧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弱点。

同时，越南战争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发展相重叠，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发展，成为对美国世界霸权的重大挑战。在越南战争初期，苏联的修正主义领导人并不觉得

⁸⁵ *Ibid.*, p. 137.

¹⁰¹ *Ibid.*

¹⁰² Le Dua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p. 123.

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去挑战美国，在国际上他们的路线是以与美帝国主义和解和合作为特征的。但到了1968年，虫子已经开始转弯了（译注：英文谚语，用于形容最温顺的生物也将寻求报复。）。苏联人正在迅速建立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对美帝国投以嫉妒的目光。他们大胆地进军捷克斯洛伐克，以扼杀对他们在东欧的卫星国的挑战。他们的总方针开始成为一个更公开的与美国竞争的方法。他们开始不仅仅把越南战争看作是一个“可能引发世界性冲突的危险”，在他们觉得自己准备好之前就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而且还开始关注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对他们自己的侵略计划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当然，与此同时，他们还继续试图管理和控制越南的斗争。因此，越南人民的胜利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而且其革命的背叛也给苏联在一个战略地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哨。

但是，古巴反对美国殖民主义的革命，以及后来的背叛，落入苏联帝国主义的魔掌，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不同的是，越南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角色比古巴重要得多。同样，越南共产党的路线，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假扮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重要、更有影响的负面作用。

胡志明早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越南共产党经过各种名称的变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相当高的威望。而且它以最高的威望开展活动，并在其折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锦囊”中提取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公式，而当时革命者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存在着很大的困惑和不清楚。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党人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了刺耳的攻击，文化大革命也在中国国内对修正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几乎一天比一天清楚，这场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进步。但是，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被彻底暴露和孤立，也绝不是被彻底打败。在这种情况下，越南领导人的中心主义和最终公开的修正主义，刚从客观的、毫无疑问的革命斗争中走出来，只能在国际上加强修正主义。

然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都坚决支持越南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革命中国尤其如此，它不仅在政治上维护了越南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而且在非常现实和物质的意义上是越南斗争的“大后方”。这仅仅是机会主义吗？当然，中国的马列主义者知道越南党内的情况，也敏锐地意识到越南领导层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倾向，甚至是绝对巩固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中国虽然对越南党的政策或策略表示了一定的关注，甚至在少数时候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一主旨作为他们全心全意支持战争的理由。中国革命党人认识到越南战争的进步性、反帝性与领导人日益严重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矛盾。而且他们很清楚地明白，只要这场战争还在进行，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前者。中国有自己的经验，资产阶级民主派伪装成共产党人，但毛泽东和与他站在一起的人认识到，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条件下，这种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进步的作用。而今天仍然如此，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即使是由公开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势力领导的，也能在客观上起到对帝国主义进行打击的进步作用。

甚至像越南的情况一样，美帝国主义的失败为苏联的渗透打开了大门，这些斗争如果是真正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一个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代理战争（如埃塞俄比亚和德格的假反帝国主义，或安哥拉内战期间的情况），这些战争就会对整个帝国主义体系造成打击。而从长远来看，一旦人民群众在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中被唤醒和动员起来，即使没有完全被唤醒和动员起来，那些试图逮捕和压制人民群众的这种觉醒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

毫不奇怪，现在统治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以及他们在世界各地的马屁精，发现今天在此基础上（值得被抨击的他们的修正主义）批评和攻击越南人是如此不可能。中国的修正主义者被锁在由该地区资产阶级民族利益和帝国主义联盟的竞争所带来的与越南的痛苦斗争中，他们不可能像对苏联那样对今天的越南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这样做，只能是拿镜子照照自己的修正主义。他们只能对越南人抛出薄薄的种族污辱，指责他们践踏中国的地盘，而他们的同党，如美国共产党（马列），则挖出琼-贝兹等人，重复美帝国主义侵犯“人权”的口号。

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进步劳工党和其他不加掩饰的托洛茨基派，多年前就谴责越南的修正主义。进劳党一直是对的吗？绝对不是。进劳党完全混淆和否定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的两个阶段。因此对他们来说，凡是不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都是反动的。在越南战争期间，他们始终从自己的经济主义观点来看待越南的斗争，否认斗争的民族目标和民主目标的任何有效性和作用，就像今天他们谴责伊朗革命，否认伊朗革命在客观上给美帝国主义带来的物质打击一样，因为霍梅尼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在伊朗革命中直到现在还占据着主导地位。尽管人民解放军摆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但最终还是与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当资产阶级为了削弱美国日益高涨的反战运动而不遗余力地诋毁和谴责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解阵的领导人时，进劳党也把这作为他们与反战运动有关的主要任务。

进劳党早在1969年就声称支持中国，他们显然是在接受中国党内部对越南领导人的一些批评。但是，即使他们的批评在中国人提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方面是正确的，但到了进劳党的胡言乱语中，就完全被扭曲了，变成了他们的反面。所以，比如说，当中国人极力维护越南斗争有合法的民族主义方面的事实，同时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能把斗争进行到底，取得彻底的胜利的时候，进劳党却站到它的肥皂盒上，谴责一切形式和一切条件下的民族主义，并因为越南斗争的民族主义形式而谴责它。同样，进劳党没有对谈判问题作正确的、辩证的分析，而是站到高处，单纯地谴责谈判，声称由于越南领导层愿意把谈判当作斗争中的一种策略，他们就等于计划出卖斗争。根据进劳党的说法，不可能有谈判的问题。唯一的战略和战术是战斗，直到在军事上把美国赶出去，就这样。他们只是肤浅而粗劣地试图分析越南领导人进入谈判的路线，解释影响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什么，以及无论谈判作为一种战术是否正确，都必须继续斗争的客观条件。

而即使进劳党确实指出了对越南领导人及其战争路线的正确批评，但当他们发起那种攻击时，也是绝对不正确的。与越南斗争的高大国际意义和客观上的进步作用相比，进劳党的小气姿态如果不是如此反革命，那就太可笑了。

进劳党不断攻击越南斗争和美国反战运动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经济主义和右派主义对美国围绕越南战争所激发的革命力量和情绪的反应。他们的批评使他们有机会退回到经济主义和“工人主义”中去，甚至喋喋不休地谈论越南的局势如何可以被描述为“工人和老板”之间的斗争——用最狭隘的工会主义术语。

另一方面，它没有更尖锐地分析越南斗争的消极方面，虽然在当时绝对是次要的，但却是美国新马列主义运动不成熟和缺乏发展的标志。虽然当时肯定意识到越南革命卫队的路线和领导层有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如果对越南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有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就会对那个时期马列主义者的工作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抗击美国国内这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训练该运动的先进分子了解有关问题方面。尽管如此，全力支持美帝国主义的敌人，提出“胜利属于民解阵”的口号，正确地说，是反战运动的试金石和分界线。

今天试图推翻对越南反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判决，其可恶程度不亚于战争期间。而美国资产阶级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暴露在人民面前。但同时人民群众也能感觉到越南现在有一些腐朽的东西，要想把这一点说清楚而不落入统治阶级的圈套，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释越南修正主义的性质和根源，以及这场革命流产的原因。

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和老挝、柬埔寨一样，显示了群众起来武装革命的力量。但越南清楚而悲惨地表明，这还不够。除非这场斗争是由一个由无产阶级路线所武装和指导的政党所领导的，否则革命就没有机会进行到完全胜利。而政党本身，不管它的团结多么铁板一块，也不管它在某一时刻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进步作用，它都将不是作为革命的领导者，而是作为革命的执行者。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即千百万人的英勇牺牲和流血是否会带来解放，或者会成为必将到来的另一场重大革命斗争的种子。

— 注释 —

³⁷ *Ibid.*

⁸⁴ Le Dua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p. 139.

⁸⁶ Le Duan, "Political Report," p. 58. Our emphasis.

⁸⁷ Le Dua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p. 152. Emphasis in original.

⁸⁸ The Vietnamese consistently speak of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stead of socialism as a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communism.

⁸⁹ Mao Tsetung, "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Selected Works*, Vol. 5, p. 409.

⁹⁰ Le Duan,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pp. 89-91.

⁹¹ *Ibid.*, p. 166.

⁹² *Ibid.*

⁹³ *Ibid.*, p. 161.

⁹⁴ Le Duan, "Political Report," p. 59.

⁹⁵ *Ibid.*, p. 47.

⁹⁶ *Ibid.*, p. 92.

⁹⁷ Quoted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October 29, 1978.

⁹⁸ Le Duan, "Political Report," p. 59.

⁹⁹ Francois Nivolon, "Vietnam on the Aid Trai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9, 1977.

¹⁰⁰ Nayan Chanda, "Vietnam, A Question of Prioriti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 4, 1978, p. 13.